

大學社區報

迎新特刊

— 2024 —



身份/關係

- 4 前言
- 5-7 在迎新微波爐裡徜徉
- 8-9 物競天擇的事實
- 10-12 給走讀生的心理準備 / 如果你想住宿...我想同你講
- 13-17 在地上拾起無限可能——訪問楊穎仁

求學/教育

- 30 前言
- 31-35 在時代夾縫中苟延殘喘 ——通識教育與大學理念
- 36-39 我的志願是做（黑社會）大佬 —— 訪兼職講師
- 40-42 因為財赤，學費忽爾間說加就加

組織

- 53 前言
- 54-55 睇學生會學社群自治 【投稿】
- 56-58 長風破浪會有時——訪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
- 59-60 如常在苦困裡彰顯——訪學生代表Justin
- 61-64 Indie仔，趁青春、艱險奮進，結隊搞騷吧——訪山城音樂節2024搞手
- 65-67 2024報社自白——追逐報架的人，你們在追求什麼？

目錄

編者的話

校史

- 前言 18
- 似有還無的中大理念 19-22
- 教我如何逗利是 23-25
- 血汗校園 26-28
- 肥上瘦下 29

生活/理念

- 前言 43
- 同枱修行，不如一齊食宵夜？ 44-45
- 社會縮影嘅縮影：煮出來的凝聚力 46-47
- 這是一個還待大家創建的空間—訪山承咖啡廳 48-49
- 中大求生指南 / 環保L求生回憶錄 50-52

一齊傾偈搞活動

嚟報社傾莊啦！



多宵夜！

因為我們的惰性、不自律、匱乏的創意、過度的自信、時間管理的缺乏、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依然不負責任地拋下工作去旅行的無恥……當你拿到這本《迎新特刊》時應該已經是十一月左右了。想到這裏，我們只能以一句「比起剛剛入學，新生們嘗試了兩個月的大學生活後再讀《迎新》時的感觸會更多」來讓自己好過一些。但無論如何，我們東拼西湊，總算出版了今年的《迎新特刊》。

《迎新特刊》是報社在每年的八月左右出版的刊物，內容主要論及大學生，特別是初來乍到的新生在大學中可能會遇到的社交、身份、前路、求學等問題，亦會夾雜報社成員想讓同學們認識的議題，諸如大學意義、大學生的社會責任、中大校史、學生自治、校內勞工、大學商業化和國際化、重研輕教、學費問題、社區營造……視乎每年負責出版的成員的喜好與當年的重要議題而有所調整。此外，出版《迎新特刊》亦是為了吸引新同學加入報社。由於人手和資金雙雙嚴重短缺，近年報社出版量大大下降，《迎新特刊》開始有變成《迎新常刊》的趨勢（誤）。

不同年代的大學生所面對的疏離、焦慮、迷惘都八九不離十，當我們落手籌備今年的《迎新特刊》時，發現新生要認識的問題前人早已寫過。我們似乎無法以全新的視角提出些有進於前人的想法，只能東施效顰，在前人的成果上小修小補、左抄右抄。我們開始質疑我們寫的文章能否啟發同學反思、能否在同學規劃大學四年要如何過時給一點建議、能否紓解同學在面對陌生的大學環境時的不適應……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出版《迎新特刊》，不如等到下年再出版？又或者不如在餘下的時間中專注在設計上，至少能吸引到更多同學拿起它翻閱。

當我們意志消沉，快要一蹶不振時，有成員在Signal Group中寫了段自嘲的說話：「平淡的創意卻企圖以華麗表演來掩飾，你應該感到慚愧。貧乏的想像力和技巧的沉迷，都是報社的致命傷。你做的迎新特刊沒有評分的必要，你還是回去磨練一年後再來吧。[1]」笑聲劃破了沉寂的空氣，我們好像忽然想起自己為什麼在這裏似的（詳情請參閱本刊的〈報社自白〉），終於又埋首工作。想起一路上曾伸出援手、陪伴我們成長的人，我們不敢輕言放棄。總之，這本《迎新特刊》就在掙扎和自我懷疑中倉促誕生。儘管不足之處不勝枚舉，但仍然希望它能在大家困惑時提供一點啟發。

若果這本《迎新特刊》的內容和你產生共鳴，令你想找人認真討論；或者在文中看見自己，想在自己無法融入的大學校園裏找同類圍爐取暖；又或者覺得這本刊寫得很差，想將我們批評得一文不值，都歡迎來報社傾莊。

[1]：改自動畫《中華一番！》第十三集的台詞。



脫離了中學，成為大學生，亦意味著即將在法律上成為成年人。步入了新環境，各種新的身份和關係亦隨之襲來，而我們急於尋找自己在大學的定位。

迎新營是建構我們在大學的身份和關係的第一道關卡，和同儕呼喊著書院口號的同時，你又有沒有問過自己想要一段怎樣的關係？在身份急速轉變的瞬間，會否令你喘不過氣來？人際關係的極速拉近會否令你不適？〈在迎新微波爐裡徜徉〉和其後的五首詩可能會令你有所共鳴。

離開迎新營，在幾年的大學生活中你想要怎樣的生活？常說大學會分兩種人，宿生和走讀生，面對的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校園生活。〈給走讀生的心理準備〉一文或會觸動作為走讀生的你，而有住宿的同學，讀〈如果你想住宿，我想同你講...〉也許能夠讓你反思人際關係之間的疏離。

無論你在大學經歷了什麼身份，終有一天要脫離大學，成為社會的小齒輪。在四五六年的大學裡，你有想清楚自己為什麼在這裏嗎？〈在地上拾起無限可能〉分享一位多次 Quit U 的中大師兄故事，嘗試讓你在大學這個理解自己身份的旅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答案。



文 / OhKam 撚 原刊於大學社區報 2023年《迎新特刊》

在迎新微波爐裡徜徉

在房間裡，你、Omates 和組爸媽盤膝圍坐在床上，無數對目光交會，大家都知道玩房 Game 的時候到了。組爸媽露出玩味的眼神，開始邀請大家 Round Status。很不幸，你坐在組爸媽身邊，是第一個誤入歧途的小羊。你是一個談過五次戀愛的女生，有過性經驗，猶豫著是否直言不諱。看著眼前一臉食花生的陌生人，你手心冒汗，最後輕輕吐出「A0」兩隻字；你是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青頭仔。「我都係 A0」—— 你有點緊張地說，大家沒有刻意為難你。你瞄了眼同組長相帥氣的 Omate，不禁有點自卑；每次被問及戀愛經驗，你都免不了一番掙扎。你是個雙性戀，男生女生你都戀愛過。要反問別人對象是男生還是女生嗎？可你不想向第一次見面的人出櫃。最後，你還是自己暗暗做了加減法，落下一句「我是 A1」。

Ocamp 是不少新生開啟大學生活的踏腳石，但我在 Ocamp 的氣氛之中感受到一些壓力，例如是要積極玩遊戲和與人交談。我想這並不只是個例；對於比較內向或慢熱的同學，Ocamp 的急促節奏可能是一種折磨。因此，我邀請了對迎新營觀感不同的 Nathan 和 Dorothy 分享經驗和感受，談談 Ocamp 的運作模式。

我們盤膝圍坐，目光交會，深知時候到了

在訪談之始，我、Nathan 和 Dorothy 先互相分享了參與迎新營的感受。我和 Dorothy 把不太愉快的感受歸咎於 Ocamp 的性別問題。而 Nathan 認為 Ocamp 體驗不過不失，只是因為個人原因未有太投入其中。為了找出我們經驗之間的相異之處，以及大家好像都不太能融入 Ocamp 氛圍的共通點，我們決定先從迎新遊戲的經驗感受開始爬梳。

第一個遊戲是耳熟能詳的「Round Status」。Nathan 自稱對 Round Status 沒什麼感想，小小自嘲自己是 A0 沒有經歷可分享，另一方面他也認為 Round Status 是用於熱身，純粹讓大家有個話題能展開對話。他自覺遊戲沒有強制性——「被人問嘅可以揀答或者唔答，唔想講嘅人可以話自己係 A0（咁就唔會被追問）所以我覺得有咩壓力。」

「我唔明點解要同啲咁識嘅人分享感情狀況。分享本身有問題，但點解唔係隨著關係變得熟絡而自

然地交流？」Dorothy 看來，Round Status 的問題不是內容本身，而是對象和氣氛。一來，剛認識對方就問及感情狀況這種比較私隱的事情很奇怪，像是跨越了好幾層防線和別人套近乎，容易冒犯別人；二來，在 Ocamp 的設定下，Round Status 其實是有強制性的。

的確，沒有很多故事又坦然自若的人可以輕鬆度過，不過如果我們在 Round Status 的身位不同，遊戲體驗就很差勁了——有過數段戀愛史和性經驗的女生會擔心被 Slut-shamed，A0 的內向男生可能會為自己一張白紙的感情狀況自卑，性小眾可能要當場出櫃。

當別的 Omates 都願意回答甚或分享自己的經歷，我們或多或少都感受到要參與其中的壓力。是的，你有拒絕的權利，可以選擇用 A0 明哲保身，或勇敢地表示不願意回答。但最終，無論是說謊、誠實，還是迴避，都免不了一番掙扎，問題是，我們真的有必要承受這份壓力嗎？

Pleasure or pressure

對 Dorothy 來說，Round Status 只算小菜一碟。組花草遊戲帶來的不適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覺得組花草好似選美比賽，唔明點解呢個活動要存在。我聽到有啲人喺到 Judge 組花草嘅外貌，當時我覺得好靚。」Dorothy 直言對組花草選舉感到抗拒，認為被選中的仔女不被尊重，旁人沒有權力以評審姿態批判他們的外貌。她也提及一個表演唱歌跳舞的環節，她好死不死被挑中，本不想獻醜，但看到組媽尷尬的表情，她覺得在那一刻拒絕很有壓力，甚至有點難堪。

Nathan 亦分享道自己不喜歡 Ocamp 的「蜈蚣遊戲」—— OC 或組爸媽會選一些男生出來，要求他們坐在地上把雙腿插入前面的人大腿之間，手臂一排繃著，肉體緊貼前後的人和地板前進，鬥快到達終點。「我唔係好鍾意肢體接觸，但係被人推咗出去，嗰個環境又有種佢著你玩嘅感覺，所以最後我都係玩咗，但我承認我係唔開心嘅。」

聽罷 Nathan 和 Dorothy 的故事，可以歸納出二人的不適感來自被強迫參加的不快，不過 Nathan 認為不舒服的感覺大多是出於自己性格問題。但玩遊戲時的不快心情，真的純粹是個人原因嗎？Dorothy 補充了自己觀察：「我本身都唔鍾意太多身體接觸，但有啲人會覺得劃返身體接觸上嘅 Boundaries 係一件奇怪嘅事，尤其當參加者全部都係同性嘅時候，佢哋會唔明點解你咁抗拒，或者覺得你係 Being Extra。」

除了個人的性格，為何搞手們沒有考慮到新生不同的需要，把責任和壓力轉介到他們身上。即使道理上不情願參與某些遊戲的同學有權利拒絕，但在組爸媽和 OC 愛的凝視，以及同學期許的目光下，是否人人都能承擔被人標籤為「唔合群 Kam L」、「好難相處」的風險，勇敢說不呢？為了維持 Ocamp 凝聚大家的集體性，把一堆人困在同個空間內，透過玩遊戲、Dem Beat 來增強新生的歸屬感，把原本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納入友軍行列，繼而形成一個看似感情深厚的群體。會否在批評那些不夠活躍的新生之前，我們先檢視 Ocamp 的環境是否足夠友善？

我們沒有受虐傾向

問題來了，其實網上從不缺乏 Ocamp 的劣跡事件，為什麼我們依然奮身跳入火坑，「明知係屎都忍唔住試兩啖」？我們指出不參加 Ocamp 在直覺上好像會欠缺了什麼，例如不知道上課時應坐在誰的身邊，不知道該去找哪些人聊天。受虐行為絕非我們心理變態，隱藏在 Ocamp 背後的命題是我們對新身分的焦慮——新環境使我們失去安全感，總想找到一根浮木開展新生活，同時為落後他人感到不安。而 Ocamp 的存在如同對大學生身分的認證，透過學習「大學五件事」、「鳩叫 Dem Beat」等等的受洗儀式，加強一眾新生對新環境的認識並確立認同感。

可惜，迎新的身分確立方法並不適用所有人。Ocamp 像一個微波爐，而參加者是裡面的食物。Nathan 努力融入 Ocamp 環境，但清楚 Ocamp 的「Firm」大多不會長久，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反而要在其他地方尋找，像一件快熱快凍的飯團。Nathan 表示自己參加的原因很純粹：識人，沒有要求能遇上什麼靈魂碰撞。他嘗試過迎合 Ocamp 的氣氛，亦把遊戲不舒服的感覺，歸咎於自己性格問題，迎合和忍耐是因明白到 Ocamp 只是一個形式，無論夜話還是尷尬遊戲，都是過眼雲煙。儘管如此，Nathan 最後還是因為覺得 Ocamp 太 Chur 而退出了。

回想 Ocamp，Dorothy 情緒抗拒加劇，「我 Expect Ocamp 可以討論下社會議題，唔係話要好似教科書咁理論，但我原本諗著點都會講下，始終我哋呢科同社會關聯度比較高。」Dorothy 本來抱有一絲幻想，卻只體驗到 Offensive 的遊戲，了解到同學都只把學系當成水泡科的落差讓人有自取其辱的感覺，於是不忿情緒一發不可收拾，像一顆充滿生命力的雞蛋，經過微波加熱，旋轉跳躍迸發出火焰。

性格內向又聽過不少迎新事蹟的筆者，始終有種「中大純樸，有人文精神」的倔強，加上聽聞「不去迎新就沒有朋友」，最後還是膽粗粗地報名，結果當然是中大泡泡幻滅 Quit Camp，像是一件冷血無情、鐵石心腸，無法被微波簡單叮熱的生



肉。Ocamp 速食的身分確立方法，顯然並不適用於我們三人身上。

旋轉跳躍的狂歡舞蹈

為何 Ocamp 要談性？說到底，OC / 爸媽只是希望能聚集一眾新生彼此認識，讓他們有個伴互相依靠罷了。只知道大家讀什麼科、文憑試考多少分的情況下，能用什麼話題促進關係呢？對 Nathan 而言，在 Ocamp 討論「正經嘢」，如個人理想、社會議題有點突兀。即使是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也只能是一句起兩句止。「講 Sex 嘅話題係自然地發生，而且 Sex 係最 Juicy 嘅嘢。」Juicy 這個字很有趣，我們通常會聯想到誰誰的情愛八卦，家庭生活、友誼關係好像都不夠「Juicy」。按 Nathan 的說法，只有討論「Juicy 嘢」才会有「哦／啊／噢／」（上揚）這樣的語氣詞，興趣明顯不符合。

為什麼只有戀愛和性別話題才有會有「Juicy」的感覺，甚至會令一群本不相識的人一下子熟絡起來？Ocamp 有一種神奇的魔力，進入集體之中，就能讓人忘記拘謹，能和相識數天的人細訴感情坎坷，把酒當歌。這種奇妙的體驗，其實等同於狂歡的原理——讓人沈醉於背離秩序的快感之中。第一種秩序，是中學壓抑的氛圍，討論性話題總要偷偷摸摸、以免引起注意。但大學生好像有一種能暢所欲言的權利，即使同學聽到了，也只會暗暗偷笑，轉頭即忘，老師更不會因你說了性話

題就捉你飲茶。大學生的自由，在於能夠肆無忌憚地走堂、鳩 Up、放蕩。

至於第二種，則是顛覆一般的交友規矩。正常來說，剛結交新朋友，我們都會從興趣愛好開始，慢慢了解對方，循序漸進地建立信任和友誼。因此，我們通常只會和很親密的朋友分享戀愛經驗。Ocamp 可能是打破了默認的社交規範，我們不再是以信任交換秘密，而是以秘密交換感情——你知道我單相思無果，我知道你曾一腳踏兩船，這些訊息讓我們從陌生人行列排除出來，新增至朋友列表。因著越過常規掌握到他人的私隱，我們獲得了窺探的快感。

Ocamp 可唔可以唔好咁樣

難道我們要禁止性、設置道德警察的角色，時刻監測大家的一舉一動，以政治正確保護每個同學的意見，才能創造一個理想 Ocamp 嗎？我們都能想像到，一個滿足所有人期望的 Ocamp 是不可能存在的。Ocamp 的問題在於缺乏選擇，無法多元地容讓不同類型的新生互相認識和交流。微波爐可不可以烹調出美味又有營養的食物，微波食品以外，又可不可以試試清蒸、焗烤、煎炸等烹調方法？

Ocamp，你可以更加好的。

《物競天擇的事實》

起初
我們是擠在同一個魚缸裏的魚
被相同的黃燈照著嚮往同一片大海
搖搖尾巴吐吐泡泡日復一日

然後我們被換到池塘
空間忽然變得好大
黃燈也變成黃白兩種有時甚至徹底消失
沒有魚糧可吃
有的開始吃蟲有的開始吃其他小魚
池塘裏每種生物都顯得游刃有餘



《交友是場狩獵追捕遊戲》

圓夜他們以一副狩獵姿態從容走近
你好我要認識你窺探你的秘密和私隱以及馴服你
被盯上時只有逃跑和裝死兩個選項
無法突破人海戰術和舌燦蓮花的天羅地網
於是擠出無害笑容交換資料和生存率



利爪在肩膀上游走使人寒毛直豎
偽裝成溫馴的樣子悄悄躲開汗津津的肉掌
他們張開血盆大口唾沫橫飛
彷彿以體液和氣味
宣告你是他們的所有物

在一輪試探和周旋以後
頭顱的毛髮被舐禿
圓月退去
這夜終於結束

《關係的開始和結束總共六句》



《有害關係的終結需要借助智慧齒的智慧》

開始時我們相安無事
忽略彼此的形狀並不相符這個事實
發炎了我臉頰腫脹疼得說不出話
醫生建議我拔除智慧齒
「你的下顎較小口腔沒有足夠位置容下它」
我安慰說凡事總有磨合期
它終究連著我的血肉
跨越進化限制堅韌生長出來
我們有和平共處繼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可能

發炎消炎發炎消炎再發炎
我們在來回幹旋間
漸漸消耗彼此的耐性
其實你的氣度無法容納下我
其實你的存在打擾我固有的秩序

打麻醉藥割開牙肉滋滋兩聲鉗子一拔
就能脫離苦海一勞永逸
怯懦怕痛並且斤斤計較沈沒成本
智慧齒說再見是為了大家幸福
其實我也捨不得
但智慧是合則來不合則去拔除
Forlorn, Adieu!

就這樣開始了
然後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交談甚歡促膝長談無話不說推心置腹預備成為管鮑之交
然後我們流於生硬疏遠的膚淺問候
所以
你最近過得還好嗎

《骷髏極樂園》

屏幕兩端是皮肉全無的骷髏
隨著一連串的革命終於迎來了究極一體化和語言的失能
我們不必費力學習以言語對話傳意
只需輕觸黑色反光磚頭就能遙控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她枯槁的手舉起酒杯
咔嚓幾聲
凹陷的白骨忽而冒出一副皮囊
未能到場的人也都興奮地喝上了酒
他以手指骨充當畫筆
在罌粟花海劃出一塊草原
以密友謊言馴養嶙峋的骷髏們

人們卸下了皮肉
以便能在這裡隨時切換身分
盡情投入到樂園的狂歡之中
沒有微笑的肌肉或歡呼的興致也不要緊
紅色愛心
為你披上熱情的外衣
也為空洞的內心塞入一塊腐肉以維持活動平衡

歌頌至善至美的樂園裡有人討厭剥皮削骨
拒絕被窺探左邊肋骨掛著的心臟
所以創造分身掩人耳目
而我選擇
拒絕你的追蹤請求
屌你老母

後記

五首詩以初入大學的背景，由淺層到深層
的交情，訴說不同關係的改變和複雜性。

從來宿位只得九千，本科生卻有萬七個，走讀於是成為不少學生的選項（或被迫選擇的選項）。我家住馬鞍山，在長期缺席書院活動下，要有宿住簡直難上加難，我因此成為了被迫走讀的一份子。可能你會說：既然我住不遠，住宿真的必要嗎？老實說，對這刻的我來說，住宿的確必要。對想體驗大學生活的你，都可能是必要。

我想先從我的大學生活說起。我在上年入學不久就決定加入報社，於是不斷參加報社舉辦的傾莊，但每次的傾莊都在夜晚時段舉行，變相我每次都要在晚上 11 點許拖着疲累的身軀追 11 點半就開出尾班車的 N 車，再視乎運氣去等一架可能要等半個小時的巴士，回到家已經 12 時許了。洗完澡？一點了。別忘了明日還要上課。

這是我想帶出的第一點：在走讀的情況下要參與校內組織十分困難。在大學的課堂最遲要七時許才完結的前提下，很多傾莊的活動都被迫要在晚上舉行，走讀生在無宿舍可回的情況下很多時候都被迫由早上留校直到夜晚，連走回宿舍放下行裝、稍作歇息的機會都缺乏，參加活動時又怎能專注？

傾莊以外令我困擾的地方就是聯誼活動，很多時候莊員在會議結束後都會落下場食宵夜，而我就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落山回家，痛失與莊員聯誼的機會，變相每次與他們相處的時間都只是在開會，很難深入了解每一個人。這我認為與走讀的另一壞處有關：在父母預期走讀生必定回家的情況下他們一定要向父母交代（至少筆者需要），我回家的時間亦不能太離譜，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 走讀生的你，又對這篇文章有無共鳴？

【第十三餐挑戰 - 女工】IG：allcancan.cuhk
撈麵 + 台灣腸

我應該已經喺呢個台叫春左好多次我係一個走讀生，走讀生最撻尷尬係當你落完堂 / 完活動，人地落宿 fng 有下場嘅時候，你就要沿住斜路落大學站返歸。

所以為左避免「啲 frd 預備落宿而我要返屋企」嘅悲慘毒撻狀況。如果夜晚喺 cu 走，我就點撻都會叫啲有宿嘅 frd 去女工食嘢，咁就可以增加我喺中大嘅逗留時間，同埋疑似貌似好似可以增加我喺校園生活體驗。（同埋延遲返屋企嘅時間）

文 / 不合格記者

給走讀生的心理準備

上莊的確不是每個大學生會做，但上堂就無論如何都一定要上。你有擔心過會在堂上認識不到朋友嗎？大學的設計根本很難容許同學間長時間的相處，沒有了中學那種長期待在同一空間的設置，同學間交流的時間甚少，對慢熱的人來說完全不是友好的環境。（寫到這裡你也大概了解到我的性格了）

長期缺乏的相處時間更可能影響同學對參與校政的投入度。試想像一下：走讀生每日都只有上課和未必存在的吃飯時間與同學聊天，這麼短的時間你會與同學聊甚麼？聊午餐吃甚麼，總比討論下任校長人選來得重要吧。筆者認為走讀生十分缺乏討論校政的環境，以及動機。對走讀生來說，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校政可能只有他們學系的課程設計，以及書通要求。對校政的接觸面少，自然無需要討論校政了。

筆者寫這篇文，並不是說宿舍生活適合所有大學生，亦不希望文章變成「大學五件事」這類論述，但我希望各位看到這篇文章的新生若不幸地抽不到宿，能夠將以上筆者寫的放在心中提醒自己未來一年要過的生活，更應不時反思自己到底想要怎樣的大學生活，才能無悔地過這珍貴的四年。

但對我來說，宿位還是要的，所以新亞書院院方如果看到這篇文章，我會很樂意接受你們提供的宿位的。

文 / 露宿生

如果你想住宿 我想同你講 ...

剛進大學時當然會有無限憧憬。自由分配時間，自由安排課堂，對討厭每天八點要到班房的人來說簡直是天堂般的存在。但很快你便會發現，這亦意味著你要自由地處理課餘時間的生活。作為大學生，卻無可避免天地堂的存在，而你同時作為一名走讀生，每天留在學校裡的時間是大概是痛苦、匆忙且沉悶的。

自己第一年在中大的生活沒有什麼記憶，我把一切歸因是沒有什麼能值得記起的人際關係，而原因十分明顯，那就是沒有宿舍。我開始明白，人與人的關係便是在這裡開始割裂，空間遠比我想像中重要。

轉變

不甘草草結束一年，Year 1 尾的時候嘗試 Reg 宿，而幸運的是來年有宿住了！！

有了宿舍的我，在入宿後幾天反面沒有玩太多的宿舍活動，但有時卻會故意早上八點來到民女，看著大家趕到校巴站然後搭車上課；沒有了匆忙回家的必要，放學時間我走到何草摸摸 Grisha 和 Misha（編按：Grisha 和 Misha 已在上個學年離世），看著大家離去歸家，深想一年前的我原來是也是這樣度過的。

有宿舍也令我開始在女工當特更，認識新的朋友，完更後和朋友爬上 Sci Cen 的天台，一邊吹水，一邊彈結他；偷偷地爬上 YIA 的天台，慨嘆原來中大有這樣的夜景；隨意地去旺角食宵夜，搭紅 Van 回到四條柱；夜闌人靜還能在中大散步，沿著環迴東路由敬文走到民女是大家的日常。比起每天要跑來跑去的生活，不再匆忙的趕往課室上課，那稱得上是我在中大真正感受到自由的一刻。

凌晨四點的中大是專屬於宿生的風景，而面積 138.8 公頃的中大更是宿生在深夜時的舞台。

We passed upon the stair, We spoke of was and when
Although I wasn't there, He said I was his friend
Which came as a surprise, I spoke into his eyes
I thought you died alone, A long long time ago

David Bowie —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享受了宿舍生活後，每年最緊張的大概不是成績公佈，而是宿位名單公佈的時候，每次看到名單上有自己的名字，感覺來年的生活也能順順利利的度過。雖說如此，但宿位有限是不爭的事實，學位在十年內已增加接近 2000 個，但本科生的宿位數量卻只增加了 60 個。我們的身份注定於宿生與走讀生之間輪轉，在轉變身份之間，我才真正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壤的感情，那並不只是我擁有中大通而已，人們常說中大的面積比香港迪士尼大，大家可能對迪士尼瞭如指掌，但真正走過中大的卻寥寥可數。

無可否認，這種空間不一定適合大家，也不一定會萌生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卻一定會成為延續人際關係的催化劑。在傾莊或迎新夜認識大家的時候，不太可能第一次見面就問：「你點睇 XXXXX？」這種關乎價值觀的問題。讓大家熟絡起來的，從來都是食宵時的吹水、庇護時發生的柴事，這些都會釀成大家之間的回憶，而至少我在那段時間是享受這種快樂的。

[1]：

2014 年本科生人數：15901；2014 宿位：7762

2023 年本科生人數：17780；2023 宿位：7822

（只計算九院於本部的宿舍，資料來自中大概覽及統計資料。）

後來我意識的是，雖然有宿舍能讓你好好地過校園生活，但人際關係卻不像以往那般固定。脫離了班房，卻每天和別人 Hi and bye；沉迷校園生活，而又似乎忘記了家庭和朋輩的關係。

那是我一次外出大圍食宵的經驗，明明家在大西北，卻向東鐵線方向走去，也許是我由中大出來，回中大是理所當然的事；也許是習慣了月台的位置，有意無意地走了過去？或者根本是我沒有思考過「回家」這個選項？走著走著，數數自己大概三個星期沒有回過家吃住家飯，和母親的對話也只停留在三星期前的最後一句訊息「唔返嚟食飯。」

老實說，我與家人的關係不算差，但也沒太多交流。開學初期時還會每星期回家渡過週末，或是平日有時也會回家。漸漸地適應宿舍生活，多了活動和新朋友，「家」的界線也開始模糊起來。直至那次我發現訊息停留在三星期前，才感覺到這種異樣，後來我發現我和母親的訊息永遠停留在：「返唔返嚟食飯？」「唔返。」每天重重覆覆，看似每天都有說話，卻不會認為那真的是一種交流。

後記

在構思寫一篇關於宿生心態的文章時，初時只想著墨在住宿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校園風景。後來和另外一位編輯相處時聊起，他在未來會減少留在中大和報社的時間，想將時間分給家人。那刻令我察覺自己亦曾經過於沉迷在校園內的生活，反令原本擁有且得來不易的關係開始出現割裂，那是我一段我曾感到空虛、迷失卻又不自知的時間。

對走讀生而言，沒有宿舍或許會令你對新環境下的人際關係感到迷失，渴望透過住宿獲得新的圈子，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對宿生來說，當我們急於尋找新的圈子時，反而開始逐漸忘記了本來的關係。當然我對家庭的看法並不適用於每個人，也許你住宿的原因是嘗試逃避家庭，但請不要忘記，即使你本身依靠的不是家庭，但相信你亦有值得信賴的朋友和伙伴。我們在尋找自己在大學的方向時，亦嘗試不要落下已淬煉多時的關係。

那時我並沒有選擇在對話中打上幾個字，反而如夢初醒地打開 Instagram，看看以前的中學朋友，他們身旁亦多了些陌生的面孔，一邊放心地認為「佢都識到新朋友！好好！」，卻無形中察覺到自己對他們亦多加了幾分陌生。

回想起我剛從中學畢業時的生活，那時雖說是疫情時期，畢業時也沒有謝師宴和 Grad Trip，但大家在網上相見的時間仍佔了很大部份。每天大家都在遊戲中的世界相見，相約出來午餐，之後再回去繼續旅程，打悶了還能深宵吹水，聊聊天文地理哲學戀愛八卦。那時雖然沒有面對面的活動，卻多了互相傾吐心聲的時間；雖然本身已認識了數年的時間，卻對大家有新的認識，聽到新的秘密時也會不時心想：「原來你都可以有依一面？」

大學是我們人生中第一次脫離固有關係的一個階段。不同於在中學每天哭笑的日子，人際關係的離合總是過於急速，與家人，與中學的朋友同是。宿舍更像是遲來的羽翼一般，將自己迅速拉離與家和朋友的距離。

後來我推掉了一些本身在大學裡的活動，回到了家，亦嘗試約了一些中學時的朋友出來，心中有幾分陌生，卻沒有不適。

文／陳秉鳳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09 年《迎新特刊》

在地上拾起無限可能——訪問楊穎仁

路是一條還是多條，在於你主不主動去理解周遭的環境，認清教育和現實的差距。

（編按：在中學時會有很明確的目標：入大學，但很多時候讀大學只是我們跟著社會的期望。這個學科是我真正想讀的嗎？大學生身份對我的意義是什麼？雖則文章久遠，但社會脈絡已隨時代變化，Quit U已不是一個好選擇，若你有此念頭，容我借用哲學系師兄可樂的說話來嘗試令你考慮其他選項：「休學雖可恥但有用；轉系或 Defer，總比 Quit U好」。即使如此，我們對出路的迷惘卻沒有因時代改變而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楊穎仁的故事或許能為你指出另一條路，但最重要的是，選擇權在於自己手中，不論你最後決定是怎樣，嘗試在大學的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楊穎仁比我大九年，我入學生報傾莊時他已是報社職員，一頭鬚髮，身材高挑而瘦，說話深入淺出。我上莊後當了總編輯，都叫做係出糧畀佢，形成了奇妙的僱傭關係。編務繁忙，我偶然對他有些怨懟，他回應我以一篇一篇他寫的，議論縱橫的文章。報社雜亂，他文氣迫人，每次回來他總一手拿起一些碗碟，一面咒罵我們這等小鬼，一面清理環境開始工作。去年九月，他重回大學校園，在浸大讀社會學，先前已經讀了兩次大學仍未畢業的他，是否能助我們瞭解「出路」到底是甚麼？

First Quit：完全的失範

2000 年，楊穎仁當時就讀中大社會學系，恰巧又是我半個師兄。時值二年級下學期，他一份論文都沒交。

「唔知份嘢點做」，他說那是個瘋狂逃避狀態。一年級時好些，初級的科目較少要寫文，僅有的勉強做完。但當時學不得其法，可以看的書太多，自己又沒有一個學習的焦點，用心寫的論文分數不成正比。升上二年級有了古典理論及當代理論等較深的科目，「一覺得自己唔識，就唔寫」。其他同學即使不太認識都可以抄抄謄謄得一文章，但他卻就是不行。

另一個他面對的難題是人際網絡。在中學只學到怎樣將自己「縮埋一嚟」，不引起任何注意；上到大學整個中學的人際網絡崩潰，並沒有特別想

做的事或想認識的人，只努力地維持一個中庸的自己，上了細系，既不特別頹，也不突出。與人的關係既無法把他留在校園，交不到論文亦令他覺得「無面」回去，「那時很傻豬，遲了幾個字就不去上堂」，面皮既薄，也沒有動力回校，連校方、Tutor 打給他的電話也沒接。如果他那時拿起電話，大概可以試升三年級，那就會變成另一個故事了。

離開了社會學系是無可無不可，因為他本來就對這科的歸屬感不大。楊的父親讀工科出身，建議他讀職業治療，楊雖不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卻知道自己不要甚麼——「要我鋸木連條直線都鋸唔到」。本來想揀心理，但父親想他讀社會，許是怕他不能與人交際太過自我，但結果似乎是一半。

楊的父親在他大學一年級時過了身。他當時並沒有想此事對自己的影響，但事實上，家裡少了一個人鞭策自己，經濟也因為有保險而沒有太大負擔，楊才一心的「頹」下去，終日躲在家中。到母親發現時已是學校寄出最後通牒後，頓時一哭二鬧三上吊，甚至指責他是謀住幾十萬保險。他說對於一個完全迷失的人，錢不算是甚麼，但卻令他想到，自己不能投入讀書，可能是不夠異化——七年的中學生涯，過的是人哋界乜你就讀乜的生活，不用想，不用決定，機械式的運作。當時他有朋友讀會計，跟他說只要捱幾年就能出頭云云，那年還是講 Big 5，不是 Big 4。既然母親以為他要的是錢，讀社會學又失敗收場，他就決定轉讀會計，走一條看似安排妥貼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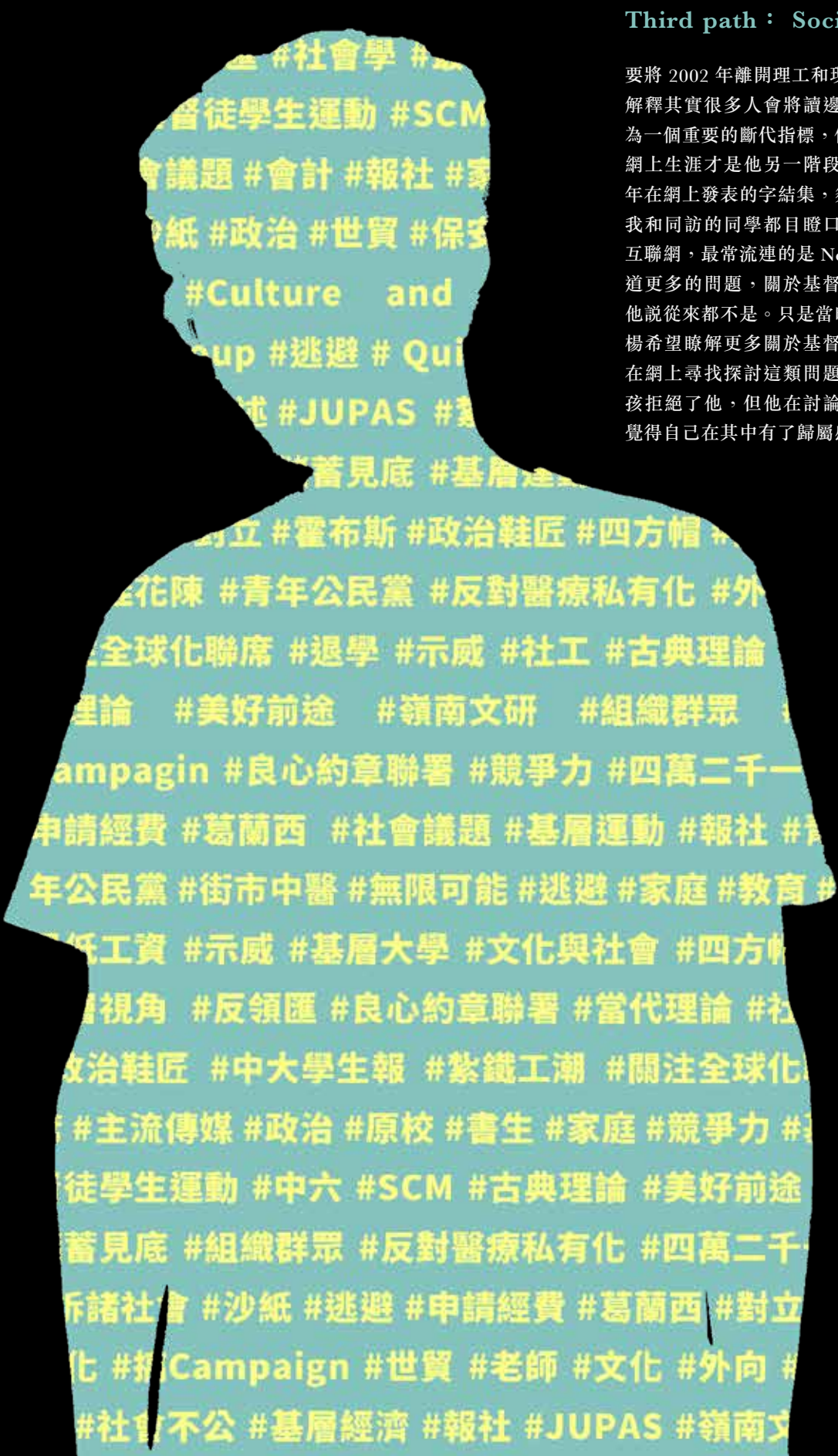
2000 年底他再報 JUPAS，報讀理大會計，等入學那段時間則補習及打了一份做倉務及入數的工。

2001 年 9 月，他重返校園，這次待了一年。

Second quit：道路在落差之中

無法繼續的原因是會計太過形式主義。讀社會學時無論自己怎樣迷失，上課上 Tutorial 都會認真預備討論，但在會計時著重的更多是 Power Point 夠不夠花巧，內容次之。那時他裝出一副外向 Look 和同學交流交際，但那些百幾蚊餐的邊爐巴西燒卻令他吃不消。他對理大同學的印象也深，覺得他們真的較靈活，隨時可找到兼職，求生力強，他卻似乎不能成為那種人。未幾懷念起讀社會學時的生活，通識 Take 了科 Culture and Society，坐第一排，讀葛蘭西。在反差中察覺自己想讀的是甚麼，楊很感嘆代價實在很貴。

第二學期的會計課他已經全部沒上，在圖書館看理大存量不多的社會科學書籍，在通識課時遇到的講師又找他幫手做當時中學綜合人文科課程教材，既有了收入來源，而會計又讀不下去，於是再次 Quit U。「今次醒啲，收埋得耐啲」，他笑得有些奸險，沒有太快被母親發現，算是比第一次成功。後來母親一直都希望見到他重返大學，帶四方帽，那種「成功」的幻覺令楊坦言已沒法繼續，當找到更有興趣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去捱一些苦悶科目的能力。尤其一直以來信那套「平步青雲」的幻覺的並不是他自己，在理工讀那科 Culture and Society，現在回想也許不算甚麼，卻已是他口中的荒漠甘泉。



Third path：Social movement

要將 2002 年離開理工和現在接上，還差七年。楊解釋其實很多人會將讀邊間學校，或求學階段作為一個重要的斷代指標，但對他而言則不太適用，網上生涯才是他另一階段的開始。「如果將那幾年在網上發表的字結集，夠我係中大畢業十次」，我和同訪的同學都目瞪口呆。他入大學才初接觸互聯網，最常流連的是 Newsgroup[1]，而他想知道更多的問題，關於基督教。問到他是否教徒？他說從來都不是。只是當時有個心儀女生是教徒，楊希望瞭解更多關於基督教的問題，於是成為了在網上尋找探討這類問題的「非教徒」。後來女孩拒絕了他，但他在討論區裡的身份卻生了根，覺得自己在其中有了歸屬感，參與度亦高。

當時參與網上討論的人質素都較高，幾千字來來去去，甚至會辦「準學術」的辯論。這是他大學以來第一個能給他支援的群體，亦能討論深入及認真的議題。他以之和學生組織對照，那時傳媒描述的學生組織都不甚了了，他自己又需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不敢多時在外，故此網上生涯既幫他訓練文筆，亦操練了思考。

後來甚至和群組裡的人發起較行動性的事情，包括一份「良心約章聯署」，倡議道德介定應從人出發，而非規條或信仰，抗衡某種覺得「非洲咁多人死係因為不信心」的論調。後來想和網上的朋友出書或刊物都碰釘，討論好的內容結果網友都沒有交稿，楊開始知道網上動員的侷限，但他既然發現了一些基督教界的問題，就覺得不能退縮。

在這種背景底下，某天他在理工大學校園裡看到一張基層大學（下稱基大）的海報，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希望學習如何組織群眾，搞 Campaign，他若有所思地說：「如果嗰陣一個唔該見到搞青年公民黨，畀佢吸咗入去，咁就真係……」楊認識了基大的搞手與一班很有心搞基層運動的人，當時組織性亦強，在 2003 年時他們搞了個探訪清潔工的落區行動，晚晚落區都有一定人數的隊伍，參與的同學很多。那時的基大是基層團體與工會及大專院校之間的中介，他們在院校中找同學作培訓，包括搞讀書組、落區、和不同的基層團體接觸，讓同學組織活動，如探訪基層工友或組織舊區居民，搞講故事計劃等等。

中學時經濟科是楊覺得最有趣的科目，難得與現實有關，又好像可以系統性地解釋事件。但中學經濟一味講供求決定市場價格，楊發現當中沒有解決過公平與否的問題。入基大後，接觸到更多的基層問題，開始明白單靠「論述」、「討論」、甚或「吹水」似乎缺少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基層人士的問題不會在「吹水」間消失——他們仍是住在板間房、仍要被老公打、仍等不到公屋、工資繼續仍被拖欠……要解決問題，便需要一套帶有行動性的視覺。而這與楊的關注點亦吻合，他需要一套解釋及解決社會狀況的論述，使基督徒即使放下宗教視野仍能分析社會。

由 Quit U 開始，楊的每一份工/ 每一個機會，都不是在網上求職版/ 報紙/ 勞工處得來，而是靠人際網絡。有些是半職、兼職、Research Job，中途也有儲蓄見底的危機，但馬上又搵到工。你話到底係咪 Quit U 對競爭力影響好大，似乎不是，楊的厲害之處是，既能每月給家用 3,000 元，又能養活自己，更儲到些錢回大學讀書。他很節儉，平時回中大總是吃 11 元的餐蛋飯，有時是 5 元三個面包，買一瓶廿多元的桂花陳已醉得舒暢，偶然放縱和女友弄一個咖啡甜酒雪糕吃。生活模式固然會引起與母親爭執，但也不算甚麼解決不到的問題。

上年 9 月他回大學讀一年級，這次他目標明確，是為了沙紙。其實早一兩年他都有盤算讀書，試過嶺南文研，又 In 過 IED[2]。但他說其實只要目標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甚麼而去讀書，既不需要被入讀的學科限死，更毋須進入院校體制。那為甚麼要文憑（一年四萬二千一！）？那是為了將來多一點路途可選，那路途仍然指向運動而不是前途，這可能是最讓人訝異的地方吧。

對於將來運動的方向，楊有過很多很多想像。例如在基層團體任職，則可能要面對團體太小型，處理行政事務之餘已無餘裕搞政策、或者為了申請經費，勉強辦一大堆看似沒政治性的活動把時間都消磨掉，等等問題。後來他提到英國史家霍布斯邦講述工業革命時歐洲的政治鞋匠——他們真的是鞋匠，工作時間地點較自主、有時間閱讀、能接觸群眾、可養活自己，那時有一些這樣異議者。那時楊認真想過做街市中醫，奈何行頭太窄不易進入，也想過做社工，最後是教書。教書的好處對他來說是可以慢慢影響學生，正如他也會影響他的補習學生，或許能帶動他們行動；打破老師、家長、學生、學校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他們認清真正的教育問題；籌組一個更基進的教師工會。他又提到現在的自己太書生，除了第一次 Quit U 後做過倉務都沒有打過基層工，所以他又密謀考個保安牌，看看有沒有人肯請他這種手腳纖幼的保安。又或者他畢業後仍會選擇去做紮實的工人組織工作；或者做主流傳媒，摸索主流論述是怎樣砌成的，「又或者，我讀上去，行學術呢……」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路是一條還是多條，在於你主不主動去理解周遭的環境，認清教育和現實的差距。一般人的思路是當發現個人問題不能靠個人解決時，就要訴諸社會。楊是倒過來的，他一開始就問憑甚麼講個人利益，既然社會條件本來就如此不公，為何要從個人出發。所以他從來都是想怎樣把自己放到對運動最有用處的地方，那已經不是個人前途的問題。

中五會考放榜，他一心與心儀的女孩原校升讀中六，努力讀到 28 分回來。可是他喜歡的女孩子不能重返原校。當年選科，喜歡寫作的他理應選文，但為了社會上所謂「較美好的前途」而選了不甚有興趣的理科，相反女孩是出於興趣選讀的，楊覺得自己等於是搶奪了她的位置。於是他開始質疑：「我怎可以說自己的家庭比別人的家庭重要，我條命又如何比他人的有價值」。說到這裡他有點激動，那神情，在很多次聽他說起某些不公義的事情時，反覆出現。

後記

楊穎仁在訪問裡兩次提到，後悔當年沒有參加學生組織，例如上報社。我笑說「如果你上咗報社，依家就係我老鬼了」，他答道，那又有甚麼分別呢？我和他一樣讀社會學，二年級下學期我 Take 了當代社會學理論，錯過了一些課堂，追不上閱讀進度，不願意蒙混過關，結果也不合格。但我想我來年會畢業。在學生報，在和楊穎仁的相處之中，我想我繞少了許多路，當然楊在那些額外的路上看過很多我看不到的風景，我面前的路也不見得筆直，但我們在此處相會，各有所得。

[1]：以前流行的討論區
[2]：香港教育學院的簡稱，現已升格為香港教育大學

校史前言



放榜後，只知道自己入了中大，還要在幾天內便選擇書院，你或許疑惑書院到底是什麼，但疑問亦被隨之而來的繁瑣入學手續淹沒。踏入中大之初，你會對校園的生活、捷徑感到好奇，但一個月後，你反而會問：中文大學到底是一間怎樣的大學？為什麼中大叫「中文」大學？為什麼會存在書院制度？中大的「人文精神」又從何而來？

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的「校史」章節，編輯們總會嘗試解答這些問題，而無可厚非的是，認識一個地方，就要從歷史開始了解。

我們或會認清，中文大學就是由反抗殖民而起的大學，書院先賢各自帶著理念由中國南下香港，理念在香港得到彰顯。同時，我們也許會感受到那些創校理念被中央集權、國際化、市場化帶走。除了複雜的權力關係和資源分配制度，過往校園裡的學生、工友、教師他們又面對著什麼問題？他們在抗爭什麼？在爭取什麼？在認識歷史的同時，我們或許能多一份批判，亦對身處山城內的人多一份關懷。

不要忘記的是，作為山城裡的學生，我們亦屬於歷史的一部份，讓我們帶著這些疑惑，一起閱讀歷史，探索歷史，創造歷史。

P.S. 在出版時發現無法在〈校史〉的章節中輯錄太多文章，但為增加讀者體驗，編輯們決定在底留下文章補充歷史脈絡，可以的話請先了解創校歷史再閱讀。



輝煌校史以外：
書院聯邦至集權與沒落



權力與抗爭無法割裂
——校園抗爭簡史



靈魂被抽乾 殘留著軀幹
——國際化下的中大

似有還無的中大理念



閱讀完整內容及註，
請見網頁。

文：Jaco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2 年《迎新特刊》

歡樂今宵
虛無飄渺~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二字，可以解作「中國文化」，象徵著中大是一所傳揚中國文化的大學。而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乃出自《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當中的「文」字其實是泛指一切的學科，點出了中大的使命：把中國的資料吸收和融化到各個學科，予以發揚光大 [1]。不過，要深入探討中大的理想和辦學理念，僅從校名及校訓是不夠的，必需從中大成立時的社會情況說起。

中文專上教育的興起

四十年代，國內正值內戰時期，不少難民為逃避戰火，移民到香港定居，1947 年至 1950 年的短短三年間，香港人口由 150 萬大幅增至 230 萬。面臨如此巨大的人口壓力，當時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專上程度及中小學學位供不應求，故港府於四十年代末開始積極推行中文小學發展計劃，開辦政府學校及擴大資助中文小學學額。中文中學仍然由私人辦理，1952 年中文中學的總學生人數直逼二萬人，故政府首度舉行香港中文中學會考，參加者一共 920 人，給予他們認可的資格。

而在南遷的難民中，當中有不少決心發揚中國文化和培育知識青年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大學教授或著作豐富的學者。他們以設備簡陋、租用得來的課室開辦一些被稱為「難民學校」或「流亡書院」的私塾，提供以中文教授的專上程度課程。根據香港政府在 1952 年的調查，這類學校一共多達三十多所，其程度參差不齊，其中開設四

年制文、商專上學術課程的則有九所 [2]。直至 1957 年，在私立專上院校就讀的學生共達三千多人，較香港大學學生人數高出三倍，而且還有迅速增加的趨勢 [3]。

但是專上教育並不是大學學位。於中大成立之前，只有香港大學可以頒授大學學位，但當時的大學政策和很多中文中學或中文專上教育學府相違背，不追求知識上的突破，不著重中西文化的融合，只希望培育出可以投身政制內人才。當時英國對殖民地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可以從 1949 年馬來西亞大學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了解：「教育設施必需用作培養各種公務人材，這是大學的首要任務。」[4]當然，這種人才的需求是很狹窄的，所以港府只把大學僅僅當作體制中的一個機關，並把大學教育維持有一定的特權。雖然當時中文專上教育發展十分蓬勃，但港府並不希望有另一所大學出現。

港大根本不是一個選擇

當時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明顯地重英輕中，其政策減絕了港人對原有文化的懷緬，同時深化了文化上的殖民，以至港人與自己文化的決裂。從中學的數量來看，當時隸屬教育司署的政府中學，英文中學佔17間，中文中學卻只有6間（但就讀的學生中卻超過99%是華人學生）[5]。此外，英文中學會考始於1937年，但中文中學會考卻遲至1952年才開始。加上當時港府始終不肯承認中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削減了不懂英語者的就業機會，精通英語便漸漸成為一種政府認可的社會地位，從而歧視中文使用者，尤其是中文中學的學生。

另一層面，中文中學所推行的是三三學制，英文中學所推行的則是五二學制[6]。如果中文中學的學生有意升讀港大，必需於中學畢業後多花一年時間去修讀英文特別班，而其中除中文科外，所有科目均以英文教授，基本上與英文中學的中七無異。一個接受了六年的中文教育的中文中學學生，讀全英語教學的港大當然是不合適，但是以英文特別班作為銜接亦是囫圇吞棗。無疑，這個學制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沒有一個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認可高等教育。

中大的成立：打破港大的壟斷

1951年，當時港督葛量洪爵士成立了專責小組，調查本港高等教育的情況[7]。報告指出，相當部分的中學生認為香港大學提供的教育沒有吸引力，同時建議港大提供以中文為授課媒介的課程，但遭港大以無法兼顧為由而堅決反對。社會只好寄望於私營的中文專上學院，當中包括日後組成中文大學的三所成員書院：新亞書院、崇基

學院和聯合書院。有幸得到不同團體和各界人士的贊助及支持下，三所院校漸具規模，均擁有國際水平的師資，並以發揚中國文化，配合香港社會所需為目標，向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三所書院所頒授的學位，亦獲眾多歐美大學承認——唯港府仍堅持港大為唯一的大學，不承認其學位。

1957年2月，三院為打破港大的壟斷局面，成立了「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爭取政府的資助，並以獲資格頒發港府認可學位為目標。同年5月，協會向政府建議成立專門為中文專上學院負責的學術委員會及資源分配委員會，為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鋪路，港府亦於翌年8月決定建議興建第二所大學，作為中英雙軌制下中文學校體制的最高學府，認為「就香港情況，這幾所私立專上學院爭取成為中文為媒介的另一所大學誠無不當，亦非不受歡迎」[8]。1959年，港府承認協會所主持的統一文憑考試，翌年通過專上學院撥款法案，把專上學院立法從教育條例中獨立出來。同年，港府成立專責小組，邀請富爾敦勳爵[9] 當主席，研究新大學設立的細節，並提交《富爾敦報告書》，為中大成立作準備。

香港中文大學就是從反獨裁的抗爭中誕生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於1963年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同時亦把三院的精神揉合成中大精神，即「專而不偏，精而不窄；繼往而來，融匯中西；律己以嚴，責人以寬。」[10]；而其中所實行的書院聯邦制，學科及人文教育可分別於大學及書院的層面推行，達致「學科為本」及「學生為本」，有助學生追求知識的同時，亦不忘做人處世應有的修養，兩者皆回應校訓「博文約禮」，與港大成了強烈的對比，其中理念有四：

（一）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

華人雖佔全港人口的絕大部分，但中文卻在殖民地政策中被嚴重的壓逼；而教育乃社會上不可忽視的一環，中文作為這城市的共通語言，很應該有一個良好的學習體制供本地的學生以母語學習，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教育，以中文為主要的教學語言教學。中文大學作為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學府」[11]，自然地擔當起這個責任，打破英語在香港高等教育及官場上的壟斷。1963年，第一任校長李卓敏博士在港督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暨第一任校長就職典禮當中，以全國語演說，完全不含半句英文，亦無翻譯，這等情況於英女王的代表——港督所主持的典禮之中，

實屬首次[12]。李卓敏校長亦曾表示過：「中文是我們的母語，中國人之視中國語文猶如子女之視母，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在任何中國人說來，為天經地義的事。」[13] 故由中大成立起，捍衛中文已經變成中大不可忘卻的理念：1968年1月12日由崇基學院召開的「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研討會，並發表聯合公報，要求政府把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以至1978年11月14日，由中大學生會舉辦的「中文教學前途」公開論壇，帶出另一次的中文法定語言運動[14]。至今，中大仍是唯一可以用中文授課的大學，而內部通告、紀錄亦採用中文，此乃歷史原因及理念所遺留得來的寶藏。

（二）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文大學為發揚中國文化而成立，承存了新亞、崇基、聯合的辦學宗旨，其民族精神是不容忽視的。中大學生會會歌開首亦解釋了其民族精神的傳承：「開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我們還要不停地，我們還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確立了中大對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所以於創校初期成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旨在保存和推廣當時被港人忽視的中國文化，至今亦為中文大學其中一樣引以為傲的建設。另外，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其中一個很有

效的方法，便是把其文化融合至不同的範疇，這亦是中大的一大使命。以李卓敏校長的話來論證：「中大的目標將在於運用現代探究及解釋方法，尤其社會科學方面之方法，以從事中國及東亞發展之研究工作。更確定的說，中大鼓勵師生培養新覺察及新方法論，俾能對傳統文化成績及具有地區特性之問題，獲致嶄新識見。進一步言之，此種傳統價值又須與現代世界聯繫以作研討評估，在文化互動之全景中，達成明顯有力之表現。因此，中文大學應成為聯繫古今東西之雙層橋樑。」[15]

（三）學生為本的教育

《富爾敦報告書》中提及到，構想中的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須具有雙重任務：一是對學科的專業知識之闡釋與傳授，一是對學生的潛能之挖掘與啟發。前者乃「學科為本」，必以學生為對象；後者乃「學生為本」，必與學科的內涵相關。對於一個完整的大學教育來說，二者不可分割[16]。故中大所推行的書院聯邦制中，大學本部負責「學科為本」，而書院則負責「學生為本」。「學科為本」的教育應該不難理解，但是甚麼是「學生為本」的教育呢？

以《富爾敦報告書》的說法，「學生為本」是透過一種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理解力、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從而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提高其學習水平。簡單來說，這種「學生為本」的教育就是導修課[17]。導修課的精神在於對學生的「個別的關注」，以小組教學法拉近師生和同學之間的距離，從而創造出積極而有建設性的交流。此制度乃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所推行的書院制中，書院部分的精華；而事實上，此與中國傳統至今的教育體制是十分吻合的。



閱讀完整內容及註，
請見網頁。

教我如何逗利是

文：獬
原刊於大學社區報2023年迎新特刊

大學要辦得成，並不是有塊招牌、一兩句口號就行。問誰拿錢，錢怎麼用，通通決定了大學的獨立程度。大學創立伊始，手空空無一物的新亞書院拿的是美國雅禮協會的錢 [1]；聯合書院拿的是國民黨的錢 [2]；崇基不必多說，教會自然財政豐厚。三院合併之後，政府每年投入大量公帑到高等教育，亦離開包括恆生、利氏家族的捐款。

去年中大有近15,000名本地本科生，乘以 \$42,100 的學費，學費收入不到中大總支出的十分之一 [3]。那就要依靠政府、企業的資助，然而錢也不是白白拿來，這當然是一種投資：政府為未來香港知識型經濟作投資；企業則要洗刷社會責任，同時培養勞動力。理想的情況下，大學能夠享有相對自主，尤其是學者、學生能夠決定大學的方向，完成其百年樹人的目標，同時承擔起社會責任，回報公眾。但在實際的情況下，從整個社會的效益計算到政府的權力干預，大學並不能獨善其身，近年隨著香港的政治變化尤甚。這篇文章將會用兩個角度，分別講述撥款如何打壓院校自主這個脆弱理想。

// 朝三暮四 //

中大成立時為達到「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採用四年制。後來，殖民政府在 1977 年提出統一中學和大學學制，中大需改為三年制。當中原因是為加強市民對殖民地文化的認同，方便管治，尤其當時英國採取一年預科三年大學的制度。此舉還能降低學位成本。

學生以至校長、各學院及書院院長均反對由四改三，指三年制不足以維持創校理念。翌年以罷課、自發舉行研討會等形式抗爭，其中「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集會有超過 2,600 人參加，包括李卓敏校長。政府面對激烈反抗聲音，只好承諾十年內不重提「四改三」。

1988 年，十年之約屆滿，政府再次要求改變學制，當時已被任命為中大校董會主席的利國偉，又被任命為教育統籌委員會的主席，發佈報告書並遊說中大師生接受「四改三」。校方再次與學生組織聯合起來，在諮詢期內組織了多場大規模抗爭。

但面對政府在財政上強勢壓迫，所有抗爭也徒勞無功。1989 年 10 月，UGC 的前身 UPGC 向大專院校明言，若不接受四改三，將得不到有關的學額和撥款。中大迫於無奈，唯有低頭。

諷刺的是，在 2012 年開始，大學學制因政府實行中學及高等院校學制改革，兜兜轉轉又回到四年制。

（四）通才教育

中大初成立時，與港大其中一個最大的相異之處，就是中大實施的四年制課程。中大的教學理想是「全人教育」，或可稱為「通才教育」，要求學生在大學教育中，除了本科專業知識達到一定的水平外，還有廣博的知識，有綜合思考與分析能力、內省外顧、高瞻遠矚，以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及負上社會歷史文化責任。所以中大四年制學制的精髓在於通識教育、雙語教學法以及學

兩大魔頭：校董會與 UGC

可惜，理念終歸理念。

中大是在香港政府授命下成立的，港督是當然校長，所以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也直接影響到中文大學，其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就是校董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

先看校董會：校董會主席由第一屆起為關祖堯爵士、簡悅強爵士、利國偉博士、利漢釗博士，以至今天的鄭海泉博士，五人皆為本港重要的資本家；再連同校董會內其他校董，眾人所牽涉到的企業和資本，幾乎等於香港所有重要的工商業，包括各大銀行，而這一類董事佔了校董會人數中的大多數。作為大學行政上至高無上的機構，校董會的決定亦即大學的一切政策。由一群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的人，操縱大學的一切發展和方向的政策，我們還能期望他們實現怎麼樣的理想呢？

再看 UGC：一所大學的運作和發展，不是單靠學生的學費或捐助所能夠支持的，而 UGC 正正就是政府撥款給予大學資金的機構。不過，UGC 是根據香港的經濟狀況，去評定大學需要多少資源和發展，從而撥款予大學。換句話說，UGC 完全可以限制大學的發展和運作，而事實上亦如是。中大再一次被資本主義下利益為先的體制剝奪了自主權，那又談甚麼辦學理念呢？先天的體制缺陷，加上日漸惡化的大學高層官僚化 [19]，使中大精神隨時灰飛煙滅。

生為本小組教學法（STOT）[18]。當時香港大學的課程大部分都十分專門，例如牙醫、工程、醫科等，而且於港大的三年大學中，讀完本科的課程後，根本無時間接受其他範疇的教育，學科知識相對地較為狹窄。但是中大實施的卻是均衡教育，使學生得以全面發展，避免由於知識的專門化所容易引起的狹隘眼界和封閉心態，培養既具有專業知識，又具有通達遠大眼光的知識分子，更切實地回饋社會。

還有另一個致命傷：三權歸一

1969年3月，UGC 審定中大1970至1974年之四年計劃的撥款時，指示中大必須加強中央功能，並向政府建議折減撥款約四分之一[20]。此項審定逼使當時的校長李卓敏博士委任專責工作小組，研究大學教育方針、大學與成員書院之間的關係以及大學未來發展事宜，其研究重點則在於如何減少因書院聯邦制而形成的行政經費過高之上。最後再次邀請富爾敦勳爵來港，並於1976年3月發表的第二次《富爾敦報告書》，建議中大採取單一性的行政結構，以取代原來的聯邦制，並把一所大學的所有權能，授予大學本部，包括教務及發展方針、財務管理、擬訂課程、頒授學位等[21]。中大書院聯邦制的精神至此完全破滅，權力收歸中央，象徵著中大教學理念的淪陷。可惜低處未算低，2005年由劉遵義所推行的一連串國際化事件 [22]，連保留中文的地位都可以放棄，中大的理念可謂名存實亡。

結語：一切都是虛無

容許我引用前校長金耀基博士的話作總結：「中文大學的成立，對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壟斷局面提出挑戰，她提供一個不同的制度，對香港的整個高等教育產生一種壓力，對很多基本問題提出疑問：中文教學的問題，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問題。」[23]反觀當下，這些疑問仍然適用於今天的狀況。是中大自己無法實現其理想？還是社會不允許如此「不設實際」的理念？作為一個中大人，此時此處亦不禁流下兩行淚水。

// 校董會改革 //

自 2019 年後，政界對於中大追擊從未停止，如立法會就曾擬否決中大興建實驗大樓的撥款，講到明是政治原因。即使段崇智急急忙忙請來中聯辦官員、鄧炳強來看國慶升旗，抑或是簽聯署支持國安法，依然無濟於事。

而 2022 年末的校徽山雞變鳳凰一事更讓人大作文章。本來是校友、學生、學校之間的內部事務，卻讓立法會要「代表 700 萬市民」監管中文大學。在這個時候，立法會邀請了 UGC 的秘書長鄧特抗來講，中大是八大唯一沒有完成按照 UGC 報告改組校董會，將所有問題推到「大學管治存在嚴重問題」。

在新的方案中，特首作為校監能夠委任更多人進入校董會，同時立法會議員的席位增多。如果單從梁振英、港人港地「暴大」的說法去「追擊段崇智」表面上太過政治化，而挪用 UGC 文件，則可以義正詞嚴地稱中大何以成為「暴大」是一個歷來已久的管治問題。

以往中大要提修例方案，都是自行遞交草案，但這次是由議員校董張宇人寫草案，在特首同意的情況交上立法會。可想而知，如果中大是個「唔聽話嘅細路」，無論是立法會的大筆撥款還是 UGC 的經常撥款上，未來處處阻滯。

錢錢錢 錢滾錢 如意算盤叮嚀響

除了明刀明槍地干預院校自主之外，手握撥款權還有更加陰濕的玩法。縱觀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其實就是不斷地「降本增效」的過程。就連 UGC 成員組成也貫徹了這種意識形態：成員由政府委任，其大多來自於商界，如現在的主席同為證監會主席[5]；即便是有院校代表，亦礙於身分同時代表院校和審批研究撥款，有利益衝突，難以發言。錢在政府手裏有著「量入為出」、「審慎理財」的教條，教資會當然全盤照收，以賞罰機制、競爭原則等方式分大學撥款，而一切大學的支出必須是產出可量化的效益。

隨著香港的產業轉型，金融和服務業需要更多管理人員，低成本的大學生成為了其經濟方針的基礎，但金融風暴令政府重新審視對於高等教育的預算，希望能增加成本效益。政府曾在千禧年考慮過推行學券制以及分科收費，好在最後不了了之。而後沙士來臨，在 2004 年大學經費又大幅削減 10%[6]。那麼如何確保大學能夠運作下去？政府祭出了錢搵錢式的配對補助金，讓大學去自行籌款，再按照大學籌得款項再作撥款，同時鼓勵大學開辦自負盈虧課程。言下之意，院校須提升籌款能力，減少對政府的財政依賴。

UGC 亦非常注重為院校瘦身：通過企業式管理，令大學的行政效率增加，從而減少浪費。這最早

可見與2002年的宋達能報告書，希望大學管治架構夠精簡。審計署在隨後一年點名批評中大架構架床疊屋[7]。除此之外還要以企業的問責模式管理，將商界代表搬入八大校董會，並要求校董會設立審計委員會等。理論上不浪費公帑的想法看似合理，但就操作而言，盲目以量化大學的價值，無疑是一種工具理性至上的看法。到了 2016 年更推出了三年制的問責協議，以求監管大學。

唔夠你卷添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的趨勢是大學撥款越來越零散，競爭機制亦佔更多比重。撥款分為三類，第一類大學能夠自行分配的，按學位數目、學科類別撥款的整體補助金；第二類則是按需申請的非經常性補助金（比如建造宿舍資助四分之三），以及通過八大競爭的研究資金；第三類是配對補助金[8]。

對於大學的第一個挑戰是，多年來整體撥款幾乎沒有增長，而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入入以競逐為本的研究資金。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大學為了能夠拿到足夠的資源，只能推向惡性競爭。

對於整體補助金在研究方面的運用，UGC 又希望能更有「效益」，直接指向追求國際研究，卻造成本地研究的沒落。以往大學收到一筆過 包含教學及研究用途的撥款自行分配。2013年，UGC 決

定將原有撥款的四分之一，單獨抽出，需要通過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來審核分配，而準則就是學術 論文在國際期刊的引用率。

國際期刊的引用率首先取決於研究議題夠不夠國際化，用教資會的話來講，是否「世界領先」。比如說研究香港本地的養老服務，一定不夠「Significant」。在最新的一次評核裡，大多本地研究被冠上了不夠國際影響的標籤，要求增加比較研究[9]。西方學術、商業機構想要的是通過香港來看中國，而政府想要的是相對價值中立的自然科學、工程、醫學等等。先不說本地議題能否登上西方學術機構的期刊，就算能夠刊登，本來研究的學者就寥寥數人，引用率必然不高，本地的研究就逐漸失落。

當大學的財政收入與研究成果掛鉤，也會造成「重研輕教」的問題。有終身教席的教授為了能負責研究項目，需要減少教學，再由更廉價、沒有保障的兼職講師擔任教職。而剛入職的助理教授因為是三年＋三年的合約制，需要在合約內滿足研究成果評核，同時還要承擔大量教學職務，沒有足夠心力是可想而知。

編按：

這篇文章在去年暑假寫成。一年過去，有些事情變了，有些道理沒變。風雨飄搖下，我們與理想的大學越來越遠。商業審計的意識形態依然存在，除了 RAE 外，筆者有一次與主修科的外國教授閒談，聽聞還要有 Impact 指標，他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經是在做教育育人的工作，怎麼還要為一些量化的“Impact”逢場作戲。有些撥款增加了，但依然難逃斤斤計較的態度。

校董會改革通過了，秋後算賬校徽事件。段崇智通過校方發布題為「中大澄清失實傳聞」新聞稿解釋，但被校董會勒令撤下，然後某些政棍一直追擊段崇智：「不要讓段崇智跑了！」如那些人所願，最後段崇智提早結束任期。一手打造香港企業型大學管治，有份寫出「大學在商界保持緊密聯繫時，亦需靈活應變、反應迅速，這樣才可較接近商界的一般營運模式，不致拘泥於學術界在決策上的傳統作風」的吳樹培副校也因政治被辭退。頂替吳樹培的新副校陳維安沒有任何在大專院校服務的經驗，上任之初有兩則爭議；一是他曾向港大提出的薪金遠超建議數值；二來他曾為校董會副主席、校長遴選委員會主席陳德霖創辦的智經研究中心擔任召集人，難免有馬房文化之嫌。

以往拋頭露面的是校長；代表全校師生，代表整所大學的氣魄；代表社會除了商業算計與醜態之外，還有進步的理想。校長要得到師生的認可，要有交流會，而校董會從來都不向師生交代，卻愈加插手大學管治。似乎在今天我們更加難理解究竟是校董會治校，還是師生治校。

我們亦不必灰心，新人代表新機會，若果政棍的矛頭不再指向新校長，是否有機會讓我們慢慢從廢墟中拾起一片碎片，讓學者、學生、職工去研究去做他們所想的事呢？我仍然期待這一天，我們亦必須努力說服全世界，大學的理想需要實現。

對於教學用途的剩下75%整體補助金也不容樂觀。在 2012 至 2014 撥款年度，UGC 要求各院校抽出6%學額，然後大學再遞交建議書作重新競逐[10]。院校規模大、辦得時間久，資源自然豐富，就能夠拿出一份靚靚仔仔的建議書。長久下去，院校之間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懷抱著博雅教育理想的嶺南大學每年的學額都要扣減，三大學額卻繼續增加。

小結

回到最初的問題:大學的錢從何而來?既然是從公帑而來，但為何撥款政策鼓勵的是西方視角對於中國的研究，而不是對於本地居民生活的探討?到頭來，大學並沒有享受自主，也沒有實在地為公眾負責，只是不斷地生產年輕勞動力，滿足企業以及經濟的需要。

我們期望有風骨的學者能夠捍衛大學獨立之精神、承擔大學之責任；然而事實是，在這體制化的壓迫下面，這些人需要追研究，幫學校完成評核，實在太難再講什麼百年樹人。但這個問題放大而言，為什麼需要考慮更有成本效益的教育模式，這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已經不只是政府或個人意志能夠完全概括了。

血汗校園

文／ Kelvin、雞、那一片白、勞工撚
編／ 不學巫術

原刊於大學社區報 2023年《迎新特刊》

編按：

我們乘校巴穿梭於校園、在課室內討論不休、課後於不同的活動室吃喝玩樂……但這些安逸、快樂和知識上的交流，若沒有載我們的校巴司機；為每個課室、活動室打掃的清潔工；興建 新大樓的建築工；為我們批改作業、準備課堂的合約教師和助教，還怎可能發生？他們對我們很重要，但這麼多年來，我們除了一句「多謝老師」和「唔該司機」外，還有什麼交錯的地方？

所謂勞工，指的並不只是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人，而是受僱於僱傭關係的人。大學生畢業後若非創業或提早退休，我們都會殊途同歸地成為勞動力大軍的其中一員，這些職場的壓迫，將來的你也很可能會面對。

學生遭到不公對待，尚且可以發聲抗爭而沒甚麼後顧之憂。但多少工友和教師，受盡剝削和壓迫，卻為保飯碗而忍氣吞聲？

2009年1月：油漆工工殤 校方不聞不問

一名外判油漆工在中大工作時，因三米高工作台翻側而不幸身亡，判頭卻拖延恤恤安排，最後只願付部分殮葬費，不願付家屬生活費。再者，外判商竟欺騙死者家屬指中大不准路祭，而跟校方和死者家屬會面時，更多次把工殤責任推在死者身上。

至於校方也一直對事件視若無睹。校方先後以「無預約」及「高層正在開會」為由拒絕接見家屬和同學。直到家屬及工業傷亡權益會聯同聲援同學到烽火台抗議，校方才正面回應事件，並承諾墊支殮葬費和生活費。而負責監督外判商的EMO，先是沒有盡力協助家屬處理死者的身後事，甚至處處偏幫外判商。工權會、中大員工總會、女工合作社、學生報、幹事會，及中大基層關注組跟進事件，為家屬籌款，並發起簽名行動，要求校方確保中大工程安全。

（詳見《中大學生報》2009 年 2 月號、3 月號及 4 月號）

2009 年年底:導師正名

現時中大教學人員分為教授、講師及教學助理三大類。講師在「正名運動」前稱為導師，薪酬只有教授的一半甚至更少，工作量卻是教授的兩倍。

2009年中大校董會擬向立法會提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其中一項為更改「教師」的定義。在新定義下，導師不包括在「教師」之列，意味大學無意改善過去導師薪酬低、工作多年仍維持合約制、未被長期聘用的情況。校董會不顧反對通過修訂，幸得立法會否決，指出新定義有「明顯漏洞」，要求校方重新諮詢。

員總發起「導師正名運動」和聯署，認為不少導師有博士學位，學歷不遜於教授，導師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與肯定。2010 年，學校成立導師事宜專責小組，之後向導師公佈書面報告，並宣佈中大已經為「導師」正名為「講師」，但實際與導師的升遷及薪酬要求相差甚遠。最後，有關升遷和起薪點等訴求終被接納。

2011年2月：校方監管不力 建築工友堵路討欠薪

七名負責善衡書院工程的建築工人，在2011年過年前夕被外判商佳運工程的判頭拖糧兩個多月，迫於無奈在年廿九於善衡書院對開，發起罷工堵路行動，要求即日取回應有的薪金，同學亦到場聲援。各方和佳運周旋了半天，佳運的支票才送到。原來工友曾向校方求助，但未獲受理。校方亦並無追究佳運的責任。

後來，有人在新書院建築工程進度簡報會，問及校方會否設立機制監察外判工程「判上判」、工殤等事宜，校方竟回應:「我們沒有責任及沒有資源做太多事情。」

（詳見《中大學生報》2011 年 2 月號、3 月號、4 月號）

2018年：和聲廚師例假頂更 工傷後不獲續約

和聲 Canteen 早前由跨國企業漢莎承辦，一名助理廚師於 2016 年一次超時工作期間受傷，之後被通知不獲續約，亦少付長期服務金。助理廚師在和聲 Canteen 工作了五年，期間多次「捱義氣」為公司超時工作，但漢莎長期拖欠及計少的加班工資，需多番追討才能取回。她曾到勞工處調解會上追問漢莎拒絕續約原因，但不果。

街工勞工組、香港廚師聯盟、社會主義行動、零散工陣線、中大基層關注組到和聲 Canteen 聲討對助理廚師的不理解僱，並在場派發單張促請師生及其他工友關注事件。期間，當時的和聲書院院長劉允怡教授當時亦在場，眾人多次邀請院長上前回應，然而現場多名保安以人牆隔在中間要求他們離去。院長以「食緊飯唔想受到騷擾」為由拒絕理會，最後在沒有任何表示下徑自離去。

工傷判傷程序向來需時，事件至 2020 年才完結。在勞工組的協助下，廚師最終成功獲得漢莎賠償，亦取回長期服務金。但對她而言，賠償金額並不是最重要的事，工傷為她帶來後遺症，有時站得久仍會酸痛，希望最好是未曾受傷。她說：「平時院長會過來打招呼，受傷當天也是出於義氣幫公司頂更。但事件發生後，不論公司代表，抑或書院代表，都沒有人慰問關心，可謂人情冷暖。」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
校方強迫搬離宿舍 工友聯署要求會面

中大創校初期，因地方偏遠，已有職工宿舍，供隨時候召的員工居住，以便處理晚上任何突發事件。

因應大學四年制學生數目增加，中大將原有共六幢的員工宿舍拆卸， 改建成現時的康本國際學術園和國際生宿堂第三至五座。校方先後於 2011 至 2013 年，分別要求職工宿舍工友在一年內搬走。當初校方提供宿舍給工友的條件之一是要求放棄申請公屋的權利，為的是確保工友能隨時候召。一年的遷出期不但短促，亦是無視樓價高企的現實。

工友與基層關注組同學收集反對聯署，並要求約見校方。校方在多番周旋下容許三方會談，然而未能達成共識。最後，有工友順利找到新居、有工友受到上司施壓，三位工友因不同原因退出了行動，剩下一位繼續爭取。該名工友一直承受很大壓力，最終答應與校方和解。

（詳見《中大學生報》2012 年 11 月號、12 月號及 2013 年 4 月號）

2019 年 9 月 — 現在：外判廁所清潔服務

中大向來以直聘形式聘請清潔工友，薪酬待遇較外判制度穩定。惟中大 EMO 自 2018 年 9 月起，以「試行」模式將校園多間廁所的清潔服務外判，而批出合約前技巧地繞過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審批。

中大基層關注組和中大員工總會因此發起反外判行動，他們收集超過1,000名員生和校友聯署，並多次與EMO會談，了解外判原因和資訊，EMO稱為「編制問題」、「人手不足」及「招聘困難」，而一直迴避固有工作待遇差、厭惡性勞動的問題。在外判事宜監察委員會上，絕大部分委員皆反對外判，同學亦提出其他可行方案，惟校方拒絕增加直聘人手、提供津貼、為外判工提供防疫保障等要求，依然堅持繼續外判，並不保證不會擴大外判範圍。

2023年6月：會友樓地盤工友疑中暑逝世

2023年6月，一名在新亞坊會友樓棚架負責維修鋁窗的葉姓工友，懷疑中暑暈倒，送院後證實不治。工友暈倒期間，勞工處推出的暑熱指引正生效，建議戶外工作者須每小時休息若干時間，但未知外判商是否提供休息時間。報社到意外現場觀察，發現棚架工程公司為厚瑞，但未確定是否逝世工友的直屬判頭。針對工友的休息空間，而會友樓馬路對面的人文館，其外牆張貼著「厚瑞員工避暑位置」的A4告示，休息處雖具遮蔭，卻亦堆滿雜物，也不見風扇等消暑用品。

高層大晒 基層工友任人宰割

朋友曾經訪問一名清潔工，該名工友如此形容校園的底層工人：

「我們這些最底層的人比泥還賤。」

很多時候，底層工友在管理層眼中，的確連泥都不如——很多校園勞工的決策，是暗地裡進行，不把工友和學生放在眼內。校方一直聲稱任何決策會與各持份者討論，事實卻背道而馳。很多資訊都在最後一刻才對外公佈。

再者，因為學校不難聘請基層職位，基層工友幾乎沒有任何議價能力向僱主爭取合理待遇；為了飯碗，就算被扣糧、扣假，也得逆來順受。而且很多關於工友工作上的決策也交由管理層決定，工友嚴重欠缺自主權。沒有討論，沒有平等決策，沒有完善投訴機制，如何讓工友在一個合乎情理的制度裡工作？我們談自由民主，要人民當家作主，但總忽略了，資本主義裡老闆大晒的僱傭勞動制，對眾多打工仔來說，就是最大的壓迫。

慳錢大過天 校方懶理零散工權益

為了節省成本，校方將不少職位外判出去，或以短期合約形式聘用零散工，從基層職位的保安、建築工、校巴司機，到生產知識的兼職導師，他們都面對著薪酬微薄、朝不保夕的生活。

外判與不外判的分別，在於合約內容：經學校直接僱用的員工（如 EMO 的清潔工）可享有大中員工福利，包括保健服務、有薪假期等，但外判的則與這些福利無緣。更甚，兼職教師雖由中大直接聘用，待遇反與外判工相似，不得享用圖書館和保健處等資源，每個學期都要擔心續約的問題。可見零散化趨勢已經影響著大學中底層的勞工。

校方往往以「價低者得」為唯一外判商招標原則

，外判商為了以低價營運，勢必設法剋扣工人的工資、權益。有些行業，如建築，甚至會出現多層外判的情況，令不公的事被揭發的時候，外判商可以推卸責任。

即使有些工作的確有外判的需要，例如建築工，但把工作外判，絕對不等於校方可以完全不對外判商作監管，置工友的工時、工資、福利和工業安全於不理。校方無意監管外判商，任由他們榨壓工友來替學校慳錢，實是與外判商狼狽為奸！

學生介入抗爭 真係好重要！

無疑，受壓迫的工友應為抗爭的主體，畢竟他們最明白自身的處境，關注的學生可以擔當支援的角色，作用在於增加工友和校方談判時的議價能力。校方操控著工友的生殺大權，在這不平等的勞資關係下，工友承受莫大壓力，有口亦難暢言，學生則沒有這種擔憂。工友平日上班還要打理家務，找同工開會都未必會有充足時間，更莫論發起聯署設置街站。部份基層工友年紀不輕，擔心失業手停口停，不敢隨便缺勤。大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多加支援。

再者，我們平時享用的教學服務，到整潔的課室、校巴服務、餐廳……無不由勞工的勞動而建成，在享受舒適大學生活的同時，我們能心安理得地對這些壓迫視若無睹嗎？我們經常想將象牙塔與社會拉近，事實上這些欠薪、拖糧，甚至是喪失性命的事件，正在我們身邊。

除非同學畢業後打算創業或揮霍家業，我們其實也將會成為打工仔。又有多少個人敢拒絕無償加班，批評上司的不合理要求？我們除了在網上開Post、與朋友私下抱怨外，又有什麼大規模的運動足以提高勞工在職場的話語權？只有積少成多的抗爭，才能建立階級意識，聚合改變的力量，讓勞工議題更受關注。如果你覺得校園的工友離你很遠，不妨想想，幾年後你也會遭遇相似事件，到時候你會選擇反抗還是啞忍？

肥上瘦下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6 年《迎新特刊》

文／楊皓鉞

編／媽屎

/為了節省成本，犧牲基層員工。中大自詡的人文精神不過是金玉其外？/

時值 2003 年沙士肆虐，香港經濟低迷。中大校方為符合削資目標積極計劃大規模減薪。但校方不想所有員工共同承擔，反而是要求基層員工犧牲更多。基層僱員在危難時就被拋到最前線，人文精神遇上了利益盤算，還是敗陣下來。

減薪方案：肥上瘦下

同年12月，校方正式公開「有關實施減省薪酬開支措施的諮詢文件，建議講師和高級行政人員長工隨公務員減薪6%、合約工減10%——一般文職及保安、清潔等工人長工和合約工則分別減薪6%和16%，並加上「自願減薪」等條件。據悉部份物業管理處（EMO）合約工的約滿酬金亦被刪，減幅變相達20%。同樣是減薪，中高層得以偏安；基層員工卻被置身風暴中央，兩者減薪幅度差別偌大。如此厚高層、薄低層之舉，被抨擊為「肥上瘦下」。

EMO工友的日常服務包括屋宇維修、屋宇設備維修保養、庶務及樓宇管理和園藝等。當年他們的薪金普遍約\$3,000，減薪後只得大約\$2,000，本來已是相當拮据，在沙士陰霾下，更是捉襟見肘。但時任EMO署長譚必成竟然表示基層員工需減薪 30% 才有競爭力，即他們要以接受更低的薪水來增加被聘請的機會。即使同樣減薪幅度，基層員工承受的生活壓力更大。若是共渡時艱，高層何不承擔更多減幅？

新工會成立：抗爭伊始

減薪措施茲事體大，但當時唯一代表中大非教學人員的工會——中大職員協會（職協），卻沒有讓基層工友表達意見，合約工亦不能成為會員。缺乏發聲身位和抗爭力量逼使一班中大員工積極籌備成立新工會，首要爭取推翻「肥上瘦下」：要求校方攤長三年減薪；在減薪時平等對待長工和合約工。員總更得中大學生會借出場地和職工盟等校外組織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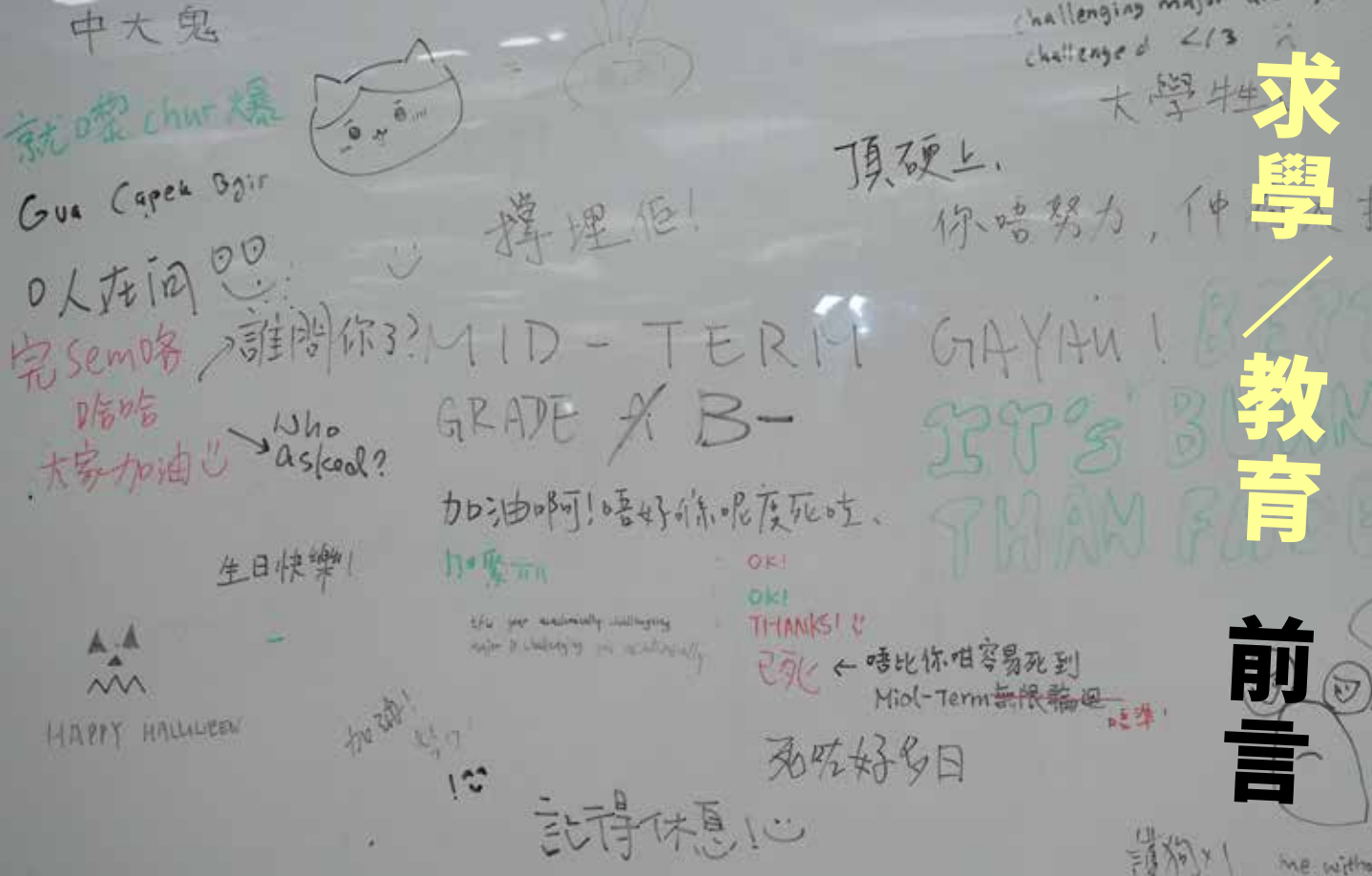
2004 年 3 月 5 日，400 多名不同職級的員工聚集在百萬大道烽火台，當中不少來自EMO，亦有不同部門的文職人員。集會人士高呼「不要肥上瘦下」，並加入新工會——中大員工總會（員總）。有別於職協，員總開放會員制，允許所有員工（包括長工和合約工）加入。創會一星期後，員總代表聯同學生、校友，聚集於大學行政樓，向金耀基校長遞交請願信，但校方為避開請願人士，行政樓竟歷史性落門。

4月中，經過員總和學生組織連番施壓，校方「放軟姿態」。基層員工除跟隨公務員減薪6%外，還要選擇再減6%或每週無償加班3小時。但校方提出所謂的讓步不符員總訴求，亦把合約工排除在外。直至8月，經多番交涉下，校方宣佈以同樣條件對待合約工。

減薪之後：肥上瘦下依然

減薪事件過去，肥上瘦下未了。校方支薪制度仍有不足，造成上下層員工的差距。2003年一筆過減薪後幾年，校方在2007年向 EMO 員工加薪 4.2%，彌補減幅。直至2016年後，加薪才被調整至6%，補回當年前的額外扣減的薪酬。遺憾的是，他們的加薪是以現金津貼形式發放，不同於中上層員工，無法計入公積金或強積金內。

轉眼20年，中大員工的待遇依然有待改善，例如合約工難以轉為長工，他們一樣付出勞力，卻不能享受中大福利。今天，同樣的工種在勞動市場相比，中大工友薪酬待遇欠缺競爭力，不少組別長期缺人，工友需承擔比以往更多的工作量，要不然便成為校方將崗位外判的完美借口。中大設有聯席諮詢委員會（JCC）旨在讓大學管理和勞工僱員討論共同關注的問題，校方有任何重要政策變動都會在會內公佈。時至今天，員總仍未為JCC成員，但仍以不同渠道代表前線員工在體制內不懈地爭取基層員工應有的工作權益。



「為什麼我要讀書？」「是為了考好 DSE。」

「那我為什麼要讀大學？」「這樣你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市場化入侵了校園。整套教育的邏輯就是一條生產打工仔的流水線。我們卻認定這是教育應有的樣子，除了賺錢以外，談一切以外的價值都是沒有意義的。〈在時代夾縫中苟延殘喘——通識教育與大學理念〉嘗試質疑這種心態。誰說只有賺錢才是「貼地」的價值？其實談價值、談理想，本來就是一件貼身的事。

當整套教育制度都被市場化，似乎教育成為一件商品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面對學費加價爭議，港府以「用者自付」、「回收成本」辯護學費加價的正當性，正正顯示了政府把大學教育視作商品的心態。〈因為財赤，學費忽爾間說加就加〉一文嘗試回應港府的理據，並重申受到教育是我們應有的權利。正當世界各地都承認獲得高等教育是國民的權利之際，為什麼我們還要固步自封？

在時代夾縫中苟延殘喘——通識教育與大學理念



「大學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地方，不要抱着什麼升官發財的目的！」
——蔡元培，前北京大學校長，約 1917 年 [1]

六月，「山城記事」的通識專題 [2] 引起了同學的討論，當中不乏對通識的批評 [3]。到網上逛一圈，隨處能見到言辭犀利的批評。什麼離地乞食、陳義過高、無用云云，與其花時間學些花拳繡腿，倒不如學些實用的知識！筆者也曾詢問身邊朋友對於通識的看法，很多未有如網上般全盤否定，而是覺得通識確有發人深省之處，令人增廣見聞，但畢竟並非專科，不應強迫學生修讀。

所謂的「大學理念」

大學是一個矛盾的概念。說起大學，我們就覺得她象徵着一種文化 [4]，是一個研究學術、追求真理、培養知識分子的地方；另一邊，我們又覺得大學要服務社會，為社會培訓專業人才。在今天看來，大學有這兩個功能是理所當然的，但它們恰恰從根本上是互相矛盾的。

其實，大學要為社會服務的想法是近代才有的。按牛津學者紐曼對十九世紀大學的理解，大學是一個以博雅教育來培養知識通達，有修養有識見的文化人（紳士）的地方 [5]，使得他們能夠在所有事上都能發展自己的想法，建立自己的人格。並透過獲得整全的知識，使其能夠勝任社會上任何工作。儘管古典大學也有開設專業課程 [6]，它從未是主軸。如牛津大學雖然有法律學系，但一直都是從學術方向展開的。真正的專業訓練要待到學生上專門的律師學校（Inns of Court）才有 [7]。哲學被認為是所有學科的基礎，即使身為高等學院的學生，也要先受到博雅教育薰陶。至 1886 年前，所有牛津學生都要通過至少一門人文學科（Literae Humaniorum）或者是古典學的考試才能畢業 [8]。那就是說，人文學科、古典學就是那時的通識。

而在德意志地區，大學理念則受到進一步的改進。康德、洪堡特等德國觀念論者之流相信不同學科乃是真理的不同面向，只要人向真理前進，便可以達致一個自主、有品格的自我 [9][10]。這個想法本質上跟「博雅教育」並不相沖。同時，除了授課外，他們更認為大學應俱備「研究」的功用。哲學家費希特認為「持續運用理性是人類實現其命運，以及每一代人在世代交替中獲得自身地位的的唯一途徑。而大學，就是專門設計來確保這個進程不會被中斷和保持穩定的機構。」 [11] 因此，理想人格是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中被構造出來的。然而，不同於紐曼，費希特和洪堡特等認為要培養這種人格，學生不能只被動地吸

收知識，還要主動地參與到知識創造的過程之中 [12]。透過自我反思來不斷挑戰一切的已有信念，繼而成就一個自主的個體——這種理念就稱為「Bildung」 [13]。學生應該主動參與課堂，勇於挑戰教授 [14]，強調師生互動的研討會和實驗課也成為了講座以外的授課方式 [15]。這種理念後來便成為了今天的「研究型大學」了。

現代的大學理念，大致上就是這束從中古而起，存養於英倫，改進於德國的思想 [16]。雖然「Bildung」的理念看似是紐曼「紳士教育」的更進一步的改進。但實踐「Bildung」的理念的前提是學生已經具備客觀分析、批判思考的能力。而這方面的需要，似乎正能從紐曼的理念上得到補足。即使兩種理念各有殊異之處，有一處是兩者都不謀而合的。它們都肯定了「知識」有內在的永恆價值，因為獲取知識的過程就是完善自己人格過程，使自己成為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信念的「自由人」。

但正當大學理念得到完善之際，它的崩壞也正在同時進行。啟蒙的餘波在輾轉歐洲大陸，「大學理念」也逐漸受到侵蝕。

大學危機

啟蒙催生了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大革命也為大學帶來了危機。數學和自然科學在啟蒙時代蓬勃發展，它們的民用和軍事用途已經不容忽視。塔列朗（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孔多塞（法國哲學家以及數學家）先後提出廢除大學制度，並以一個以數學和自然科學為主的教學制度取而代之。而兩者的構想都先後被拿到國民議會以及國民公會討論 [17]。塔列朗的構想後來受到共和國的青睞。通才教育成為了只在中學教育才有的制度，古典大學制度在 1793 年受到廢除。各類以專業為導向，只講授一種學科的學校相繼被成立。軍事大學、綜合理工學院等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而隨着拿破崙在歐洲大陸征戰，歐洲的大學都相繼被更換成法國模式。在軍事霸權的威脅下，「大學」面臨被取締的危機。

不過，德國的大學理念並沒有因此而受到破壞。踏入二十世紀，憑着德國在科學和哲學上的成功，研究型大學成功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各地的大學也爭相改用德國模式 [18]。承接研究型大學的傳統，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都經歷了專業化和現代化，學科都發展出自己的學術傳統 [19]。每個學術領域都是一個專業的領域，隔行如隔山。然而，此後的發展，又使大學理念第二次面對危機了。二戰後，美國的大學吸收了英德的大學傳統，並發展出自己的模式。隨着各行各業越發依賴具有專業化知識的人才，為了適應社會變遷，美國的大學同時成為了服務社會，為社會提供專業化人才的「服務站」。此刻的大學，已經與市場結合了 [20]。

然而，與市場結合，代表大學也要服從市場的規則。學術領域的專業化使我們不再把各個學科視為一幅彼此依存的大網絡中的一部分，而是把它們看作相互獨立的個體，可以比較高低。隨着科學方法、科學體系在工具價值上展現了它的成功，其他知識也開始面對存亡危機，開始嘗試把科學方法融入自己的學科傳統之外。然而，像哲學、歷史等較難被量化、形式化的學科，就更加被邊緣化了 [21]。

通識的意義

《啟蒙辨證法》 [22] 開篇首句說：「從思想進步最普遍的意義而言，啟蒙運動一直旨在讓人們擺脫恐懼，並確立他們的主權 [23]。」啟蒙下的理性有兩個面向，一是使人從不成熟的無知中解說，不再依賴宗教、神話，而用理性去尋找那些永恆、普遍的原則、價值來理解世界；二是以理性為工具，把可見的事物都化成可任人主宰的資源，以

保證人類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 [24]。在啟蒙以理性解釋世界的綱領下，任何事物似乎不再有任何的特殊意義，他們的本質都是可計算、可利用的，它們唯一的意義就是能夠作為工具被使用。工具性（utility）就此成為了啟蒙的新倫理 [25]。在兩次的大學危機之中，大學理念都被工具理性所擊倒。面對第一次的危機，大學理念通過自身的改變，尚能證明自己有存在的價值，抗衡工具理性的浪潮。但這次，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嗎？

隨着大學越趨專業化，大學理念卻在工具理性的浪潮之下節節敗退。誠然，知識有分科，術業有專攻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專業化本來就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然而，就是因為專業化導致學科變得相互獨立，工具理性乘虛而入，成為我們評價學科高低的唯一標準。同時，專業化使人的視野被拘束於一種領域之內，繼而把屬於自己領域的優勢當作一條評價所有知識好壞的通則，例如哲學家覺得社會學、文化研究不夠純粹、理科人覺得讀科學只是「噤銀時」，知識狹窄主義便如此叢生 [26]。而那些碰巧以實用為優勢的學科，受到社會以工具價值為重環境所鼓勵，高舉了「實用學科才是好知識」的旗幟。這才使得大學理念踏上消亡的路上。

張燦輝教授 [27] 曾言通識的理念就是想同學「認識或接觸一些大家應該共同關心的題，對抗大學的專業化」 [28]。換言之，通識的意義，其實就是大學面對着工具理性浪潮之下的一個反抗。不過，通識仍是一個迷途的概念。究竟通識要教什麼、怎樣教，仍然沒有定論，但它的目標是很明確的。如張燦輝教授所講「其課程基本上要教授給學生的並不單是具體知識，而是洞察力和智慧——理解知識與世界的性質之洞察力，及有能力迎接現代生活的智慧。透過這些課程，希望能令學生成為一個『全人』」 [29]。溯其源頭，它的理念是與英、德流傳至今的大學理念同出一源

的，那就是「人格的發展」。說通識的意義是增廣見聞、培養批判性思維也不錯。不過，這些只是實現人格發展的道路，不是終點。

筆者並不是在說大學就應該只學通識，不該專業化。這不合適，亦是倒退。真正意義的通才教育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是不可能的。而通識所推崇的通才教育就是教授「大家應該共同關心的題目」，是對所有「全人」所取的最大公因數而已。專業化是現代大學一個必須有的元素。但是，大學不該只是專業化，通才也應該至少與專業教育有相當的地位。



圖二：Dcard 上一則名為「唔讀專 / 神科嘅人諗緊 D 咩」的帖文

陳義過高？

假如你是一個通識教育的反對者，這篇文章也許仍不會改變你的看法：「我承認大學理念變得越來越弱勢。但你只是在打稻草人，不影響到我認為大學理念、通才教育是沒有用、是陳義過高的論點。」但我質疑「有無 / 無用」[30] 這種根植於工具理性的思維本身已經是一個不合適的分析準則，就如評論橙我們不會說它夠不夠堅硬、評論運動員我們不會說他 / 她文采夠不夠好。說通識因為無用就不值得讀就跟宣稱因為橙不夠堅硬，所以不是一種好的水果一樣無稽。

事實上，我們生活中很多的價值根本就不能以「有用 / 無用」來評價。舉個例子，我們把圖二的對話改寫一下：

甲：照顧屋企人嘅人諗緊啲咩？
乙：我比較想知你諗緊啲咩？
甲：唔照顧屋企人可以慳好多錢。
丙：I guess 人生嘅意義唔係得錢？
甲：真係有咁多人會咁諗咩？ 😂😂

把這段對話改寫後，甲就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仆街，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家人」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用「賺不賺到錢」、「有沒有用」來衡量根本就不合適。這個很明顯的例子就已經證明了人生中很多事的價值根本不能用「有用 / 無用」來衡量。

這就是筆者感到困惑的地方了。為什麼我們劈頭便要用「夠不夠堅硬」來評價橙，然後煞有其事地分析為什麼橙不是一種好的水果，仿佛「堅硬」是唯一貼地的評價準則？很多反對者似乎都會默認了「『賺錢』以外的價值都是陳義過高」這個前提，但我不同意。「家人」這個價值總不算「陳義過高」了吧，那為什麼「人格發展」就是？前者是為人，後者是為自己的。既然我們覺得前者本身就有意義，那為什麼什麼對於後者我們就選

擇性失明，忽視它的內在價值，然後以一個不相關的評價準則來評價它？

筆者想在這裏作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們會有這種心態其實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所致。以工具價值，以實用性為重的專業化的教育往往都是以職業導向的，亦即是它的目標就是要向學生灌輸同樣的知識，使學生們在知識上成為一個同質化的群體。同時，同質性恰巧又是我們這個官僚化資本主義社會最需要的 [31]。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是每一個生產工序都被經過了嚴明的勞動分工，每個單元各司其職。而使得這些生產單元能夠效益最大化的，豈非就是專業化的人才嗎？

同質化本身就是獨立人格的反面。明顯地，沒有人甘願異化自己，一生只是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機器裏面的一個齒輪的。那麼為什麼我們卻甘願持守一個把自己趨向同質化的價值觀，讓它異化我們自己？

「全人」的概念本身就是旨在培育一個獨立的人格，一個與群體異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意義、有自己的內涵的人格。筆者相信，這種價值對於很多人而言是一個值得追求的價值 [32]。那麼，當我們否定這種價值的時候，到底我們真的是出於真心，還是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灌輸？

「教育是作育英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前途無限，而這個前途是包括前途的『前』，以及金錢的『錢』」
——梁錦松，第一任教資會（UGC）主席，2009 年 [33]

（編者按：原文附有參考資料來源，因篇幅所限刪去，敬請於網上版查閱。）



[6] 古典大學一般開設藝術、法律、神學、醫學四大學院。後三者所讀因為學習內容較為專業化，被合稱「高等學院」。藝術學院主要學習哲學、古典學、歷史、修辭、數學等知識，也就是「博雅教育」。

[22] 本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作之一。本文的分析進路借用了《啟蒙辨證法》的歷史哲學框架。例如文中對於啟蒙、工具理性的批評，都是本書開創的。筆者所以使用這套框架，乃因有覺這套歷史哲學框架十分契合時下人們對於大學教育理念的心態轉變。

[27] 前中大哲學系系主任及前通識教育部主任，任內參與策劃「與人文對話」（UGFH）及「與自然對話」（UGFH）兩課程。

[30] 由於圖一所呈現的論述大多把「賺錢」與「有用」掛鉤，筆者在這裏暫且把兩者當作同一種東西。

[32] 筆者認同，假若社會環境惡劣到一個地步，大部分 fresh grad 也養不活自己、根本沒有錢照顧家人、社會環境達到一個難以生存的地步的話，還大講通識理想的確是不設實際的。但只要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淪落到那麼，我們的生命還存在保存自身以外的價值的話，「全人」的理念，還有它存活的空間。

我的志願是做（黑社會）大佬——訪兼職講師

訪、文：Me6uo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21 年《迎新特刊》



「高等教育界同黑社會嘅結構係好接近。喺黑社會，你會見到好多人願意冒好高風險去做好少回報嘅工作。好似賣白粉，你一畀人捉到就坐幾碌、十碌，但賺好少錢。點解咁多人做呢？因為個結構好 Flat，上面好少人，下面好闊、好多人做細。好多手下做打手、賣白粉、黃賭毒，但上到做大佬嘅得好少好少。點解咁多人係下面做？因為佢哋成日見到成功例子，唔會睇到失敗例子。你見到啲大佬好風光咁出出入入，當然都會好想自己係咁，就會好努力付出好多，直至廿年後你只能 Stuck 喺個啲（做細嘅）位度唔知想點。」

「高等教育界其實差唔多：讀書嗰陣見到啲教授，你就會想像自己做到，覺得幾好呀，社會地位又高，人工又好，又相對自由，唔洗返辦公室，嘩好正呀。但係個啲係黑社會大佬。下面一大堆嘍囉就會仰望住嗰啲人，嗰啲（位置）其實你又未必可以做到。你喺下面幫佢賣白粉，然後若干年過去你會發現自己行唔到落去，讀咗 PhD 嘅你已經三十幾四十歲，你跳唔到出嚟，你亦都唔會想跳返出嚟，仲要睇有冇人肯請你。」

兼職講師和其他兼職工作要面對的挑戰無異：人工偏低、沒有固定合約、福利少且不穩定。然而，要成為一個兼職講師，起碼也要有一個碩士學位。那麼問題來了，門檻高卻又不穩定，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前赴後繼地想要入行，難道真的是為了要做「黑社會大佬」嗎？兼職講師所得的人工和付出是成正比，還是受盡剝削？中大兼職講師並沒有一個劃一的制度——請人、合約內容以及解僱準則都是由各部門自己決定的，不同兼職講師的待遇可能並不一樣。所以，下文會由 P 講師的角度出發，並綜合〈大學裡的一粒小小螺絲——訪兼職講師〉[1] 中任教人文學科的陳講師（化名）的訪問，以更清晰地瞭解中大兼職講師所面臨的挑戰。

僧多粥少下的妥協

「有咩原因驅使你做兼職講師？」

P：「我仲讀緊 PHD，要搵份全職嘅工就有可能，為咗錢，咪去做兼職講師。事實上好多學科，你讀到上去博士之前就已經知道係死路一條。死路嘅意思係一定要從事同學院相關嘅工作。最理想係，如果你鍾意又做到研究，喺中大就係做教授。但事實上嗰啲位好難爭——全球招聘下，（教授）每年喺外國都已經供過於求。如果你想讀 PhD，又想留喺學院，兼職講師就係最常見嘅選擇。同一時間我都覺得份工有意義，我真心享受同學生嘅互動。面授嗰陣我會嘗試記啲學生名，落堂嗰陣同佢哋去食 Tea、飲咖啡。」

陳：「我做兼職講師係希望可以學以致用，而且全職講師實在太少位，我有 PhD，符合唔到做全職講師嘅要求。再加上我又冇其他工作經驗，要轉第二行又要有返差唔多嘅人工都唔係咁容易。越讀上去你會發現個社會根本冇咁多空間比研究學術嘅人，你讀得越專門，出路反而就越少。每年咁多 PhD 畢業，只有最好彩嘅先會擲到全職講

師個位，講緊嘅係萬中無一，其他一係炒散一係轉行。如果你後生啲嘅咪試下多線發展，比如好似我咁接下啲翻譯，都叫自己養得到自己，所以即使份工唔係咁穩定都可以捱到落去，但有時我都會覺得咁樣工作完全係為咗生存。」

失敗的行政

「既然你唔係全職講師，自然有好多嘢部門都唔會畀資源你，不如分享下平時行政上你會遇到咩問題？」

P：「我哋通常都唔會有 TA（教學助理）。每個部門都唔同，如果有嘅話都唔出奇，但通常都有。請得你（兼職講師）就係想我（部門）畀個 Course 你，你幫我搞掂佢，我唔理跟住點㗎喇，你唔好搞啲額外嘢畀我做就得。但有時應該都係睇個 Course structure，Zoom 一堂可以有 120 人，咁佢就會畀個 TA 你。但佢淨係可以做一樣嘢——改功課同埋改 Mid-term。（對比起面授）工作量係大咗，但叫有個人可以幫下你。但有時派畀你個 TA 讀嘅野又唔係你個 Field，例如讀歷史嘅研究生可以做任何一個大通科目嘅 TA，如果佢唔嚟 Sit 堂，有機會你要將啲野再教一次，佢先幫你改到份卷，因為人文學科考試卷係有既定答案。」

同埋依家我係入唔到中大，我張職員卡係廢㗎。因為係跟 Course 簽約，所以 7 月幾就會停咗我張卡。我下個星期開學，但佢整唔切個 Staff account。當 9 月 1 號開學，開學嗰日我個 Staff account 先生效，之後先可以申請圖書證同埋入到 Blackboard。但 9 月 1 號就上堂㗎喇嗱，所以我係畀唔到連結或宣佈。」

陳：「所有嘢都係一腳踢，好多 Logistics，比如要 Scan 資料上載到 Blackboard、解答選科查詢、計出席、收功課、影印資料呢堆。同埋上

Tutorial 要視乎有冇 Tutor，如果有派畀你嘅話就要身兼兩職。大部分 3 Cred course 要超過 40 個學生先會有 TA，有啲 Course，好似大學通識就唔會有，所以有時個感覺就好似佢外判畀你，你就要搞掂所有嘢。

除咗有 TA 同 Office，我哋都唔會有 Locker，就連去 UHS（保健處）[2] 睇醫生都有我哋份。喺合約同合約之間，我係完全用唔到校內設施，理論上我連學校都唔可以入。我之前試過成功爭取過一張短期嘅 Guest library card，雖然終於可以入圖書館，但因為我有 Office，在家工作嗰陣我係用唔到個 E-library，所以睇唔到 Online journal 或者 E-book。咁嘅教學模式其實好冇營養，亦完全發展唔到自己，所以我愈教得耐愈強烈感受到，我只係一粒螺絲。」

黑箱合約

「大學點樣請兼職講師同埋啲人工係點計㗎？」

P：「請人嘅話好睇部門，通常要你試教個 Course 嘅某個 Topic，試教 15 分鐘。但有時急住要人，就試堂都唔洗，直接請。因為好多時候大專學界係人搭人搵，都好黑暗下。佢信你搵個人係 OK，直程冇面試同試教就簽約。當初我都係喺 Facebook PM 學系入面認識嘅系主任搵到呢份工。但有時都會開啲正式嘅招聘廣告，但識人係重要嘅。」

至於人工方面，每個部門都唔同，我之前喺唔同部門教過，每個鐘大約差 50 蚊左右。雖然佢唔會公開計法，但我估同學歷掛鉤，如果你係 PhD 就應該會更高，如果唔係就應該同我差唔多。」

陳：「中大已經算比較好，合約人工係計 20 個禮拜，有啲學校淨係計 13 至 14 個禮拜，即係出多一個禮拜嘅人工，作為平時課堂外備課嘅報酬。

但學系從來都唔會公開人工嘅計法，亦都有薪級表或者其他指標做參考，所以我唔知其他講師嘅待遇，亦唔知自己嘅人工係咪合理。同埋我嘅人工唔包括喺學系經常營運開支入面，令我成日要等財務處批先出到糧，所以每個月出糧個日子都唔同，之前仲有試過拖糧。」

「你哋幾時先會知道能否續約？」

P：「唔知架，對我哋嚟講，最核心個問題係今年喺呢度教，下年有冇得教？唔知。每年都唔知，有時要乞啲工返嚟。如果你個 Field 有咁多位畀你教嘅話，就有咩保障。仲有你每年要教咩都未必知，好取決於人地畀咩你，明知係豬頭骨都要啃。同埋如果突然呢度冇工返，我要搵第二間院校，可能我要到 8 月尾先知自己要教咩。如果你有工做或者唔夠錢洗，就要即刻諗辦法教到。」

陳：「冇人知幾時續約。我試過喺 8 月尾被請，亦都試過 6 月就有 Offer，但無論點都好，冇人保證到我會一直有工返。通常 Sem 尾嗰陣部門會有秘書打電話問我想唔想繼續教，之後部門會再開會決定，所以都唔輪到我話事。我之前試過問 Course Coordinator 可唔可以延長合約或者加啲保障我哋嘅條款，但就畀佢用『牽涉資源撥款要由更高層決定』呢個理由推搪。同埋續唔續到約同教學表現都未必有關，因為我之前都見過有啲教咗好耐又教得好好嘅講師，突然被部門通知唔會續約。如果佢決定唔同你續約嘅話，係唔洗同你解釋，可能係突然決定唔開班，又或者開少啲，我感覺自己嘅角色好似只係要嚟塞住時間表個窿。」

沒有工會的孤兒

「近年出現咗咁多新興工會，你哋有冇參加過啲咩工會？」

P：「我估我應該可以加入中大員工總會嘅，但佢哋啲福利政策都偏向全職員工，同兼職講師冇咩關係，同埋喺香港工會力量唔大，有咩可以做到。要成立個兼職講師工會又唔實際，大家份約都唔穩定，個工會搵邊個負責？唯一方法應該係睇下中大員工總會可以點樣好啲涵蓋兼職講師，但目前為止我自己就對參加工會有咩興趣。」

陳：「我對坊間新成立嘅工會幾有興趣，但我連佢哋嘅主張或爭取咩目標都搵唔到，叫我點加入先？我覺得工會係用嚟爭取勞動條件，而唔係單憑政治表態嚟組織工人。如果個工會存在嘅目的單單係為咗反政府，咁就永遠都團結唔到政治光譜唔同嘅工人，亦都有可能用工人階級路線去令非政治化嘅人覺醒。你睇下呢十幾年嚟泛民個口號一直都係『先有民主，後有民生』，根本就冇建立或者提出到任何堅實嘅經濟性綱領，所以建制派咪可以用經濟利益同蛇齋餅粽嚟吸納剩低嘅人，佢哋亦就係我哋口中嘅『藍絲』。

結語

在大學幾年中你會遇到形形色色的老師，可能終究你不會和他們有課堂外的接觸，但總會有一兩個的教學風格令你欣賞甚或啟發了你，他們的身份有可能是兼職講師，並受到大學教育市場化的剝削，歸根究底他們也只不過是大學教育兼職化及零散化下的產物。聘請他們是為了節省學校金錢，以「重研輕教」的方式來獲取「競爭力」及「國際排名」（詳見〈教我如何逗利是〉）。

要改變這番景象並非團結全世界的兼職講師們就能成功的，畢竟世上的高等教育市場早已面臨飽和，供過於求。在不少知識份子為了一份兼職教席做願意「做爛市」的情況下，身為學生的我們可以做的可能不多，但不妨在 Sem 尾的 Course-E 踴躍表達意見，雖然不能改變制度，但也可能成為兼職講師被續約的一小個因素。

[1] 50 屆學生報「深瞳」， 2020 年迎新特刊，《大學裡的一粒小小螺絲——訪兼職講師》

[2] 大學保健處在 2024 年 4 月 1 日更名為「大學醫務處」

因為財赤，學費忽爾間說加就加

文：不合格記者

政府在今年 6 月 20 日公佈教資會資助下八間大學每年學費將由 25/26 學年起連續三年加價，由現時每年 \$42,100 逐步加至 27/28 學年的每年 \$49,500，平均每年要加大約 5.5%，總加幅則達 17.5%。

年度	學費
24/25（今年）	\$42,100
25/26	\$44,500
26/27	\$47,000
27/28	\$49,500

政府在今次加學費計劃中提出的理由包括希望改善大學學位課程多年來未達標準的成本回收率。現時 18% 的目標回收率為香港政府於 1991 年訂下的標準，政府則指預計 24/25 學年的成本回收率將降至 12.5%，因此計劃加價「確保有關界別的長遠財政可持續性。」

政府於不同場合解釋加價時都未有提及或否認與近年政府財赤有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於計劃公佈同日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政府財赤是今次加價的主要考慮因素，又表示政府未有計劃於三年後再次加價。

然而在計劃正式公佈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已約見部份立法會議員相討加學費事宜，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在政府財赤下加價屬合理。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aka 中大學生報第 16 屆出版委員會副總編輯）表示希望在經濟和公共財政困難下大學生能共渡時艱，「一齊承擔少少」。教育界議員朱國強亦表示財赤下加學費是「應該的」。

筆者根據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處（學資處）提供的計算機嘗試計算在加價後依賴貸款攻讀大學的學生，連同利息實際需多繳付的金額。筆者以「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NLSPS）作例子，該計劃的年利率設於 2.42%，最長可攤分至 15 年還清。假設學生選擇 10 年內還清，在 2032 年畢業的同學將比於今年或明年畢業的同學多付近 \$35,200，其中接近 \$5600 是因加價衍生額外的利息支出。

在決定公佈後不少學界人士紛紛回應事件，提出學生日後可如何處理增大的財政負擔。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率先開腔表示認為每月學費只會增加 200 至 300 元，同學可靠多做兩三個小時兼職彌補。朱國強亦提出學生貸款還款期可延長至最長 20 年，利息亦可調至低於 1%。

回收成本？

加學費的決定由 6 月公布到現在已接近 3 個月了，民間以至學界都不見得有十分強烈的反應，那我們應該如何詮釋這次政府的決定？我們不如先從這次政府加學費的主要理據——目標成本回收率——開始說起。

正如上文所述，有關標準是早於 1991 年殖民時期所訂下的，當時決定比率由 13% 逐步升至 18%，期間學費曾多次大幅上調，加幅更曾高達 46.6%[1]，學費上調最終於 1997 年停止，學費就凍結於 \$42,100 元至今。

1991 年至今 33 年的時間，香港政府不是未有嘗試檢討有關做法。在 2011 年教育局嘗試檢討大學學費，當時正值香港新學制過渡期，立法會亦關注可能衍生的學費加幅，教育局於是決定先參考新學制推行一段時間後獲得的經驗再着手檢討學費，並表示在沒有結論前都不會調整學費。

教育局沒有忘記他們的承諾，並於 2015 年邀請教資會為學費政策撰寫報告 [2]，為日後學費檢討作預備。該報告於 2016 年 7 月由英國專門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機構完成，碰巧地同年 10 月審計署亦公開一份關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審計報告 [3]，兩份報告的內容同樣值得我們參詳。

被遺忘的報告

先說審計報告，在報告內文中審計署公開了一個十分有趣的事情：在該報告撰寫過程中教育局曾通知審計署早於 2011 年——亦即是教育局上一次嘗試檢討學費政策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決定因目標成本回收率需要檢討，所以「現時」（估計為撰寫報告的一刻）不再有任何現行目標比率。

生活／理念前言



自此之後，除了教育局和 UGC 嘗試檢討學費政策的場合和文件外已少見其他人提及這個概念了。事實上，教育局在 2022 年公開他們每三年檢討對 UGC 撥款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4] 中完全沒有提及任何「目標比率」相關的字眼，更表示因根據 UGC 顧問報告顯示香港學費水平與境外差距不大，以及政府現今政策方向為盡力協助高中畢業生接受資助高等教育，學費水平將維持不變至 2025 年。

問題就出於此，政府在大幅度改變政策方向時有作出過全盤的諮詢、評估嗎？為何一早擱置而甚少談論的「目標比率」會突然被重提？

大學檢討學費，以至整個學費政策，絕不能一蹴而就，學費說加就加。參考 UGC 檢討學費政策報告，內容針對的遠不止單純學費的加減，檢討內容還包括政府承擔學費份量的多寡、學生貸款的方案、還款方法等等。

UGC 的報告亦強調這種做法的必要性。在該報告羅列大量檢討學費政策時應考慮的要素前，他們特別用一段強調「香港政治領袖和決策人員應討論」該等事宜後，才開始檢討和擬訂高等教育的新資助安排。

回看今次加學費的決定，政府事前有着手討論上文提及的多個因素嗎？有充分諮詢學界加學費對學生造成多大的財政負擔嗎？

即使我們無視上述提及的眾多因素，單純討論加學費本身，連 UGC 的報告都承認 \$42,100 元的學費到了今日對不少家庭仍然是沉重的負擔，在香港收入不均情況仍未顯著改善、經濟環境仍然不景氣的時候，政府憑甚麼理據在下年度調升學費？

UGC 的報告並沒有就香港未來高等教育資助安排作任何建議，但報告內容已足夠反映出檢討學費政策絕不是易事，而是「必須建基於對香港社會經濟情況作認真研究後得出的實據」，才能作出改動，而不是一句「不及目標比率」敷衍了事。

可笑的是，UGC 的報告甚至羅列了其他國家調升學費的嘗試，那些決議要麼幾乎被否決，要麼被逼撤回，更甚者提出加學費的政府會在下次選舉中落敗。香港會發生這些事情嗎？聽見諸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對加學費的看法，筆者實在不敢抱太大期望。

說到底，政府資助高等教育不單純是福利，更是政府對該地未來的投資，而在大學學位對學生重要性大增的今日，高等教育的學費以至隨後因貸款所引致的財政壓力，應在審慎評估學生的負擔能力後從長計議。

再進一步說，在世界各地政府開始將高等教育視為國民應得的教育權利的一部份的今日，很多歐洲國家例如芬蘭、德國、挪威等已由政府全額資助高等教育學費。即使以香港低稅率的情況來說，以往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額外增加三十多億的大學學費，仍可維持達數百億的盈餘。香港是否仍要固步自封，死守用者自付原則？

待有朝一日政府收入隨着經濟環境改善而恢復盈餘時，可否有空間降低，甚至在可見將來全面減免學費？這些問題絕對值得未來的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再作探討。

[1]：大學加學費 | 大學學費 27 年不變收回成本率 10 年未達標個別學科人均開支近 60 萬 - 香港經濟日報

[2]：Study of Tuition Fee Policies in the HE Sector

[3]：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資助審計報告

[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在二零二二/ 二三至二零二四/ 二五三年期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提供的經常撥款

即使沒有宿舍住，你們接下來幾年的生活多少會在大學裏度過。除了學習、上莊和談情說愛，你們還想在大學中做些什麼？

或許大部份人會想到參加書院或學會活動，但我們想向你呈現主流以外的可能性。有人滿懷理想，嘗試將它們灌注進自己的大學生活裏。雖然「理想唔可以當飯食」，但我們卻找到食飯和理想的關係。〈同枱修行，不如一齊食宵夜？〉談論食宵夜對於學生組織的凝聚力和共同實踐理念的必要，按照作者的原話就是「正經嘅事係需要啲唔正經嘅事先做得成。」想必革命同志的情誼也是從飯腳開始。〈社會縮影嘅縮影：煮出來的凝聚力〉記錄了一群想和陌生同學一起在中大煮飯的人。〈這是一個還待大家創建的空間——訪山承咖啡廳〉記下了一間想提供美味的餐飲之餘推廣藝術，甚至連結同學、為同學提供場地實現自己想法的咖啡廳。

然而，總會有人闖進自己的生活（對方也可能會認為是你闖進他的生活）。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堅守自己的原則便可能起衝突。〈環保 L 求生回憶錄〉的作者憶述了自己在大學生涯中堅持自己的理念之餘嘗試改變身邊人的故事。

或許你這一刻沒有什麼想實踐的事，但希望接下來的文章可以讓你對未來的生活有不同的想像。



想起今年三月十七日，報架被收起的那晚，很久未一起食飯的大家終於（幾乎）齊腳。對很多這年新加入報社的今屆莊員來說，甚至是第一次同枱食飯，那晚大家在深水埗一間大排檔聚腳，剛畢業、有全職工作的上莊，下班時也來了。剛坐下，我記得自己因為不願再想「報社未來該如何走？」，便請大家當晚不要再談這件事。想當然，大家怎會忍得住，然後我也忍不住了。但總之，那晚大家說了甚麼我都忘透了，最後記得的只有兩個小總結——「因為這種落難日子，終於能夠一聚也好」和這間大排檔有點 Overrated。

大家各自回家／宿舍時，兩個莊員和我坐 72 號巴士回中大，在車上時大家都累透，沒有太多說話。在赤泥坪下車後，那時我沒有經過太多思考，只想說出不斷縈繞自己耳邊的話，我說這間大學未來無論怎樣好、怎樣差，總之大概與學生組織再沒有一丁點關係吧。然後我又在心中獨白：我們總會忘記今晚這種感覺，將回到像單打獨鬥的狀態吧。若說收起報架當晚是今屆報社第一次齊腳食飯也不為過，我在那晚才能重新記起我們是個共同體。

想想其實那間大排檔也不算差，不過有間在油麻地的「老小店」更抵食 [1]，老闆會請我們飲獅威啤酒，但對我來說那小店的魅力不只是抵食，還有一些我難以名狀的美好。自從在那裏渡過幾個夜晚之後，我在別處食飯時都覺得差了些什麼。這間店是我校園生活的延伸，在這裏構築的記憶不比在中大的來得輕。

在那裡食宵夜沒有時間限制，在路邊放張摺枱擠在一隅已是個天地，接通鬧市街燈和晚空，附近的果欄工人拉著唧車往來倉庫，行人帶著狗，這是城市的某種脈搏；置身這種空間會令人同時感覺腳踏實地和浮在半空，像一場清醒夢，在那裏說的是夢話。醒來時日間的時間流轉得太快、事情的意義被賦予得很正式、骨肉分明，但像這樣半夢半醒、模稜兩可的夜晚才是我想棲息的時空。一天中恐怕只有這種時刻，我們才可以像身處電影場景般，很自然地開口問出「大家想成為的人是怎樣的」這種對白 [2]，或唐突地把有趣的點子吐出來，或起行離開時下定決心做某件事；說話會夾雜大家的情感，記憶會因此留下錨點。

世界甚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甚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創刊宣言〉，《湘江評論》，毛澤東，一九一九。

記得在籌備《2023 迎新特刊》的出版時，我們斷斷續續有兩個禮拜的時間留在某莊員的家中一直開會、吃飯飲酒、開會、睡覺飲酒、開會、吃飯飲酒。完成出版後，檢討時有人說，這兩個禮拜浪費了太多時間，深夜時大家飲住啤酒談的計劃都要砍掉重整。但如今我看來，那兩個星期我們用在吹水、迷路的時間，沒有如我們想像般被浪費掉。

出完這年迎新，一些人走了，不一樣的人們來了。我見過曾經的莊員從游離到淡出、也有對彼此失望吵架離開，留下來和離開的都總有點委屈。我不禁倦怠，甚至對自己說「還要說話、要自我表達太累了」。新同學來了，我們經過傾莊，一起出版了《三月號》，但明明我們也已認識幾個月了，怎麼還未一齊食過飯呢（我們應該沒有小圈子吧？）。傾莊那時，對於新加入的同學，我已沒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我以為因為自己是「一個人都可盡興」的那種人，也以為報社的環境條件塑造起來的關係，無可奈何地比起朋友更像同事；也想不通我這個生活扁平的大學生的想法有甚麼價值，我沒有主動去了解加入報社的新同學抱著甚麼期望，畢竟我也不知道憑自己的文字可以做到甚麼。那期可能是我的中年危機（大學生版）在發作，那時身邊的報社朋友都已經轉換跑道或畢業了，自從幾個報社朋友都畢業的日子，我便再找不到飯腳，也可能是我當時不想找。後來我和大家談了這件事。對我來說，那段對話是今年迎新特刊的起點。

自我表達是一切的起點。如果一個人的 Emo 只能是喃喃自語，是自我疏離的形式，那麼請說出口吧。讓同伴豎起耳聽那些對主流價值的控訴，生活處境中的憤慨、不快、欲望、恐懼、幻想、信念的掙扎。說了出口才會意識自己是真的想要改變，也會令身邊的人切身地感受到那些所謂「議題」的重量。談天對話不是為了再確認大家互相是 Like-minded

的，而是讓人重新連結，我們才可以有力面對現實和想像間的鴻溝。即使只是我們在不經意間說過的話，也會反映出自己深藏的幻想和悔改，那些話將如埋下的伏筆會成為在未來生活中某個片刻的解答。到時我們便會了解得自己和身邊同伴更多，也會明白這個時代和世界更多。

我現在的幻想是，畢業之後在新界鄉郊租一個帶天台的地方，在冬天叫大家隔個禮拜過來打邊爐，秋天則是在天台燒烤（雖然日後的薪金和租金定會打破我這個浪漫幻想）。也許打邊爐對從前位在范克廉樓 307 的報社不算難事。但現在報社沒有會室，莊員大多也沒有宿舍住，我覺得可算是某種意義上的「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失去物質條件總會影響一個學生組織的凝聚力，但幸運在於我們還有在油麻地的一隅天地。

這篇文章不是什麼偉大的發現。只是想告訴你，我在經歷兩年多的大學生活後才發覺那些似乎不正經的、不重要的時間，像吃飯、食宵夜、散步、開會時的過度活躍……都是我非常重視的片段和對話（對其他人來說也可以是行山、打機、露營）。在這些時光承接大家的喜悅、Emo 與想法，才能真正認識到身邊的人，某些事情也會因此順利一點。

24 迎新終於出版了，待下次食飯，說我們各自在生活中所得到的歷練，再談談那如何練就大家近來各自的想法吧。

[1]：這間店在多種意義上都算是報社能延續營運的契機。

[2]：儘管我在問這類事情時的開場白是「今晚，我們的 Agenda 是……」。



我喜歡的樂團的一段歌詞：

// 說些甚麼吧 夜晚還長的啊
哪裏有人不迷惑不受傷
大聲控訴吧 沒什麼好顧忌的啊
我會為你討伐 或者陪你歌唱 //



社會縮影嘅縮影：煮出來的凝聚力

文 / 蕉跡

流水山城

從下午開始，Whatsapp 群組裏便發來一份食物待買清單。成員相繼回覆，紛紛自告奮勇 5 點一起到大埔街市買菜，準備今晚的飯餸。到了 7 點，大家都齊聚在廚房，洗菜的洗菜，切肉的切肉，在分工合作中不時分享各自的大學生活。這和樂融融的場景，正是流水山城願景的雛形。

這是他們發起的第三次共煮會。當初創辦人 Elaine（化名）希望這個社團能把成為一個將大家聯繫在一起的地方。「在學校裏，人與人的關係都很疏遠，無論工友還是教職員。大學生與大學的關係並非如此必然，連飯都不會留在學校 Canteen 吃。」2019 年疫情爆發，宿舍關閉，上課模式從面授改為線上形式，剛投身大學生活的同學只能隔著屏幕看 PowerPoint，缺乏交流的機會，難以建立親密關係。即便有機會回校，都只覺得這是一個「無人的 campus」。「大家不在意校園發生的東西，因為沒有 bonding。我認為大學不只是一個上課下課的地方，至少大家並非你做你的，我做我的」Elaine 說。

成員 Tommy（化名）也有同樣的想法，作為學生會成員的他認為學生會和同學之間有一段不可跨

越的距離，但流水卻能消除這種距離感，讓他從活動中更理解同學的想法。這是因為流水和一般社團模式不同，是一個自發性的組織，不需要寫 Proposal 向學校匯報，也沒有一個特定的目標要達成，沒有受制於任何框架的形象。「住宿舍認識，上莊認識，好似是在某個框架中認識彼此。但流水不同，有許多空間發揮和嘗試不同的事物。」

「很多同學上到大學最期待的就是『大學五件事』，上一次莊，dem 幾次 beat，取得一個自己過得去的 GPA，如願畢業便是圓滿的大學生活了」，Emi（化名）如是說。流水希望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希望做到「全民搞手，有了想法隨即就能在群組裏發起」，就如流水這個名字一樣，「流動又貼地。」「流水不只屬於我，而是屬於中大人，是一個幫大家實踐的地方，就例如大家一起煮飯。」Elaine 補充道。

「食」是流水認為能聯繫中大同學情緒的切入點。「因為 Canteen 飯很難吃，宿生又經常杯面當飯吃。」共煮最開始是由成員 Soup（化名）提出：「我們最開始見到台灣主婦聯盟聯盟曾經推廣宿舍煮



食運動，加上過去不同學生刊物也刊登過食譜，恰好我們有些成員喜歡煮食，於是就想出了『人人有飯開』。」於是流水就有了共煮會，在 IG 上宣傳活動，並將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加入 Whatsapp 群組，活動當晚有空的話就能夠一起買餸煮飯吃飯。Soup 也希望透過菜式（如素食和本地菜）將參與的同學帶入公民議題。他們認為大學生不僅與大學越來越遠，就連與社會活動也越來越遠，希望同學明白公民活動可以在校園內部進行，而非一定是在校外進行。「例如進口蔬菜製造了多少碳足印，價錢為什麼越來越貴等等。不會開 lecture 般講經，但我們想在對話中把這些知識滲透進去。」

然而，共煮會的實踐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首幾次的共煮會中，大家的經驗並不多，而且因為起初同學都不太敢參加，參與者比較少，所以不太會安排工作。「一次 Soup 本來負責買菜，但臨時有事不能去，就有些手忙腳亂。」因為每個人都負責不同的工作，而且並非每個人都懂得煮飯買菜。但隨著活動次數增加，大家逐漸熟能生巧，「誰都是重要的，但又不是沒了誰就無法進行下去。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但有人若果無法參與，

也有其他人能頂替他 / 她的工作。」

Reading week 以後，參加共煮會的同學突然增加了不少，因此想煮更多菜式。結果因為煮太多菜，一直煮到 11 點才能開飯。以後他們就決定減少數目，和煮一些更簡單的菜式。但始終有經驗解決不到的問題。我們在體驗活動的過程中觀察到有參與者難以融入活動的氛圍當中。一來流水成員本來就互相認識，而參與者大多又是和朋友一同前來的，以致更傾向與本來熟悉的人交流。而自己來的同學因為無法融入，下次就未必想來了。「確實今年可能新參加者會難以融入，而且也沒有有效地最開始我們想推廣的理念，我們明年會再實驗新的模式，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參加。」Soup 承認道，「話雖如此，就算大家不想參加，都鼓勵大家在宿舍煮食！」

隨著「共煮會」漸漸步上軌道，他們希望以成立流水的初衷「社區營造」以及「公民教育」作為宗旨，繼續舉辦其他活動，如藝術部、放映會等。在考慮過實際可行性之後，最終決定先在上學年的第二個學期完結的時候進行「退宿回收」。

這是一個還待大家創建的空間

——訪山承咖啡廳

文 / 孤獨寫文

訪 / 孤獨寫文、cuhklawtrashtalker

百萬大道上人山人海，你卻只感到千人一面。你我只是大海中碰巧迎面駛過的帆船，我不知你的去向、你不知道我的來歷。接下來的四年，你留在這裏的時間或許比留在家還要久，你卻還未感受到家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社區營造是重要的。帆船泊岸要先有岸，要有家的感覺要先有個家，要把大家連結起來前要有個媒介。山城角樂曾經做過 [1]，但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樓空」可能也不太準確，富爾頓樓 LG05（角樂的舊址）在這個六月，又悄悄地迎來新一頁。

下單已經一陣子，東西還沒有來。也好，待我有多點時間四處看看，為文章找點寫作靈感。粉筆字寫成的餐牌琳琅滿目，巴斯克蛋糕、窩夫、雞蛋仔、千層麪，餐牌設計可謂獨樹一格。餐桌依着的牆身，排起了幅幅的畫作。最顯眼莫過於玻璃大門旁一面木系文藝色調牌匾，豎排的五隻字「山承咖啡廳」被背光強調着，宣示着自己與外邊煙火氣不同的格調。「山承」，到底「承」了什麼？根據 OSA 的報道，咖啡廳「希望繼承中大人的一些精神，例如店址前身的山城角樂的社區營造精神。」不過，在这一切光鮮亮麗背後，究竟哪處跟社區營造搭得上邊？這個地方又與中大其餘四十多間 canteen 有什麼分別？想着想着「抹茶窩夫！」

一個禮拜後，我和其他報社成員帶着這些問題訪問了山承的店主。

Elizabeth 是一個藝術系的學生，也是山承的店主。在與好友勝出了 OSA 舉辦的創業比賽後，花了一年時間籌備，終於在今年六月開始試業。作為藝術系的學生，經常納悶藝術系學生只能在許氏文化館展出自己的作品。但文化館又不常有外系的同學參觀，自己的作品只能在同溫層之間被看見。而咖啡廳作為所有人都會進出的空間，就成為適合策展的空間了。那麼策展就是咖啡廳的主軸嗎？Elizabeth 提到，策展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在藝術系學到的東西讓其他人看到，例如不同

的美學角度和手工藝。除了策展外，還想舉辦市集、工作坊等，讓在這裏擺展的作者也能分享自己的技藝。語畢，Elizabeth 如數家珍的介紹身旁的展品「呢個就係藍曬啦，呢個係版畫，跟住嗰度有一幅岩彩啦。」

不過藝術推廣活動始終與社區營造有些距離。要營造社區，固然要先聚集到背景不同的人。如山城角樂雖然以倡議環保議題、共享經濟為宗，但舉辦的活動都很貼地，如退宿回收、社區廚房、二手物墟市、電影放映等，容納到關懷各異的同學。對於很多像我對藝術不太感興趣的同學，豈非就融入不了這個空間了？當我們談到角樂時，Elizabeth 也提起了自己對角樂的想法，想搞類似的社區活動，亦拋出了很多想法。例如想搞公仔舖、Band Show。坐在旁邊的財政 Timmy 也補充了想利用剩下的咖啡渣與環保團體搞活動的想法。Elizabeth 也透露了往後想 IG 開 post，開放接受同學借用場地的想法。「咁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學生，想星期六搞個讀書會，或者電影放映會，可唔可以聯絡你哋？」「可以啊，甚至星期一至五晚嘅時間都可以呀」。希望同學們能夠吧這個地方看成一個可以聚在一起的空間，睇下書、玩下 Board Game。談到這個空間有什麼可能，可以用來做什麼，兩人似乎有很多想法，也很歡迎其他人的提案，來者不拒。究竟這個咖啡廳的未來是怎麼樣，還待各位的塑造。不過，Elizabeth 也補上了一個很現實的考慮：「始終我哋同山城角樂嘅營運模式唔一樣 我哋有一半



要照顧飲食上嘅嘢，都頗為繁忙。」

談到飲食，我要回那碟抹茶窩夫！甫入口香氣挺重，窩夫也挺脆，嘗得出是新鮮出爐的作品。抹茶味也許太重，味道過於苦澀。細看剛切出來的橫切面，果然是挺深的綠色。把頂上的雪糕抹均勻，再嘗一口，苦澀味消失了，亦補償了適量的甜味，甜味和苦味變得更加均衡了，假若讀者們要嘗試抹茶窩夫，記得要加雪糕。「日式昭和布甸！」這個也來了。一放進口，就感受到很濃的蛋味。果然和 Fusion 隨意買到的布甸分別很大。再尝尝上面的車厘子 什麼東西！我一手從口袋抓起一張紙巾吐掉。滿口的藥水味，難怪那顆車厘子粉得那麼不自然。

在與山承的訪問中，我提起了似乎食物要等很久的問題，也順便為那粒車厘子的事興師問罪！Elizabeth 笑道：「嗰粒車厘子係裝飾嚟㗎。雖然佢係食得嘅，但係唔好食。..... 日本嗰啲昭和風嘅飲品都係用呢粒車厘子。主要係儀式感、靚！」，不過比起那粒車厘子，似乎 Elizabeth 更加關心布甸的味道如何，有沒有異常。原來訪問前幾天，有人製作布甸時誤把鹽當作糖來用，結果造成了鹽味布甸。在我確認了我當天那杯布甸味道沒有問題後，Elizabeth 才放心。她和 Timmy 兩人其後七嘴八舌地描述心目中最理想的布甸——「要深色啲 實啲，之前比較水 宜家好 fluctuate……成功版係真係好好食」未能分出「水」和「實」的我，只能坐在一方茫然地聽着另外一位報社成員與兩位的對話。這就留待讀者們去嘗試兩人口中的「成功版」了。

其後又談到窩夫等食物，原來製作這些食物也有各自的困難。例如窩夫製作起來特別費時間，而她們又堅持即叫即做，造成了等候時間較長的問題。至於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她們考慮在不同時段出售不同的食品，例如窩夫等在非繁忙時間才售賣。即使工作繁忙，Elizabeth 的團隊仍計劃會定期研發新菜式，請客人試食試飲，並更換餐單。「我哋會 Treat 大家唔只係一個客人，都係平時傾下計嘅人」。除了在效率和質素之間的掙扎，山城在營運上也遇到不同的挑戰。例如 Reg Day 當天一下子湧入太多同學，應接不暇，結果讓某些同學等得有點不耐煩。這也是我好奇的問題，山承到底打算怎樣應付開學後的人流？憶起上年開在襲約翰的「賞茶」，總是要排一個多小時的隊才能喝得到。雖然賞茶人流現在回復



正常水平，但山承鋪面較小，難言不會迎來相似的局面，如果果真人滿為患，那又如何騰出時間搞活動？兩人提出了一些解決人流的方法，例如添置更多儀器、設計不同優惠分散人流等等。不過，依我來看，究竟這些方法是否真的能夠解決上述問題，未到真正實行也未知效果如何。不過 Elizabeth 也有提出一些可以平衡搞活動以及營運咖啡廳的方法。例如讓同學在週末或者關店時間借用場地，在我看來也是未嘗不可的做法。

在訪談的最後，此前在吧枱埋頭工作的咖啡師 Winston 端來幾杯飲料過來讓我們尝尝：「呢杯係西西里咖啡，佢係由檸檬汁、檸檬汽水、同埋 Espresso 沖成。」雖然是咖啡，咖啡味卻不重，重的是雪碧味。一問之下，原來是想沖給不愛喝咖啡，但想提神的人飲的。

山承在營商之外，的確很努力爭取實現理想的空間。搞活動、人情味、即叫即整不只是個 gimmick，而是一個有志於實行的理想。但是我想回到最初那個問題：究竟山承與社區營造怎樣搭上邊呢？搞活動可以是社區營造的方式，但搞活動不是社區營造本身。究竟山承想透過 Band Show、工作坊營造一個怎樣的社區？這個社區的性格是什麼？我覺得仍然是一個還需要清晰界定的問題。山承咖啡廳先是咖啡廳，然後才是一個社區營造的地方，沖好咖啡、賣好食物是它首要的目的，剩下的精力才用來弘揚它的理念。而角樂作為合作社，社區營造的理念從根本上就已經鑲嵌在角樂的理念裏面。究竟山承能在社區營造這條路上面能夠真正行得多遠，這就留待各位讀者見證。

[1]：有關山城角樂的介紹，可參閱：〈山城角樂：你、我、他的合作社〉，《中大學生報》2016 年 10 月號。



中大「求生」指南

救命水

中大同學經常在戶外到處走，2024 年全球暖化演變成全球沸騰，要多補充水份才不會中暑。口渴想找樽裝水？早在 2021 年，中大已經全面禁止販賣一公升以下的樽裝水，有錢也買不到。

初來乍到，未熟悉飲水機的位置，可以下載 CUHK Mobile 應程式瀏覽中大地圖，或者使用網上版中大地圖，選按設施 →  (生活所需) 飲水機，校園裡的水機位置一覽無遺 (準確至大樓的特定樓層)。

撲水怪膠樽

摺 lib 防 jam 遮神器

下雨天在圖書館溫習，把濕透的傘留在館外雨傘架，容易被偷。雨傘除水器在使用頻繁的情況下難保可以把你的雨傘弄乾，不如自備雨傘套。使用膠質米袋、大膠樽等材料升級再造，成本為零；買一個重 25 克的「收皮」輕便防水雨傘套也只是 \$120，避免被偷兩把傘就值回票價。

由自備宵夜杯麵又到借用可重用餐盒買外賣

一套餐具是宿舍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有朋友為了不花錢添置餐具，會收集買外賣後用不着或者其他人不需要的即棄叉子，深宵在宿舍吃杯麵時使用。後來他發現收集即棄餐具除了在環境問題上不可持續，在供應上也不可持續。為了穩定地吃到杯麵，他改邪歸正，買了一套便攜餐具。

便攜餐具打開了新世界。原來自備餐具，即時沖洗或抹乾淨，回家或者回到宿舍再徹底清洗很容易，這樣又可以在學校食堂每次節省 \$1 外賣附加費。

後來他還發現，在大膳堂入口旁有借還可重用餐盒的自動飯盒機，借走餐盒到食堂買外賣，用完只要倒清食物殘渣，便可歸還退回按金。校內六間食堂還有 ReCube 的重用盒系統，可以在食堂提出要使用重用盒，食堂會直接把食物裝進重用盒裡；歸還前的清理跟借盒機一樣，不過可以到六間合作食堂中的任何一間歸還，歸還後還可以賺取積分換領優惠券。

壓縮宿舍電費冷氣費

宿舍冷氣費越加越貴，如果可以壓縮開冷氣的時間和日子，投資二手電風扇甚至藤蓆也可以考慮。如果宿生會沒有提供二手電器交易或轉贈服務，除了到 Carousell 和舊區二手電器舖找，還可以嘗試在 Dcard、Goop 等平台的中大論壇專區尋寶或徵求。

肥皂防小偷，而且是快閃旅行必備

在宿舍洗澡，洗髮精、護髮素、沐浴露三兄弟一樽樽，用膠籃裝着走到浴室，沉甸甸的也不好拿。萬一洗澡後把三兄弟落在淋浴間，大家會毫不客氣拿來用，不如考慮使用肥皂。雖然肥皂在科學角度而言，比充滿水份的沐浴露更衛生，但說不定小偷都被噁心到，不敢偷用遺下的肥皂；而且肥皂一塊大概才 \$10，被偷走也不可惜。

除了沐浴用的肥皂，護髮素和洗頭水也有固體版本。這些產品單價或許比市面上大量生產的液體護理用品稍高，但十分耐用，只要用後抹乾、保存在乾燥的空間，並且用膠樽蓋之類的物品升起、避免接觸平面以免被積水溶化，一塊至少可以用上三個月。快閃背包旅行時帶上固體護理產品，也不用擔心上飛機時隨身行李的液體容量限制。

用梘怪膠樽

環保 L 求生回憶錄

文 / cuhklawtrashtalker



塞爆回收機的師兄

有位本來沒有回收習慣的師兄，之前是中大其中一支興趣莊的上莊，經常出沒會室。會員常在會室活動後遺下大量即棄飲品膠樽，他就會逐個收集、帶到 1A 校巴士站附近的入樽機回收，而他回收的原則是：「幹你娘塞爆。」

沒錯，就是幹你娘塞爆，他才不管甚麼入樽機的八達通回贈有每日上限、一個樽才值一毛，每次到訪會室，用環保袋收集的膠樽就是滿滿一袋，然後通通拿到入樽機。

那個月他滿了會室 5 天，現莊跑來跟他說：這一個月會室都變乾淨了，你有頭緒嗎？

後來，大學 1A 校巴士站附近這部入樽機撤走了，同類的入樽機最近也要到大埔、馬鞍山或者沙田才有，這位師兄也畢業了。之後大學百佳超市引入了滴滴賞入樽入罐機，文化廣場也安裝了綠在區區的智能回收機，可以回收紙張、金屬、膠樽和玻璃樽。

一次傾莊的時候，現莊準備了紙包飲品，也有人帶來罐裝飲品和樽裝飲品。結束時，有人掏出兩個環保袋，把大家喝光了的飲料容器都收走了。他說：「百佳入樽機的積分可以換超市禮券，綠在區區的積分可以換廁紙。」

* 紙包飲品盒要先剪開攤平，清洗後風乾才能回收。

* 文廣智能回收機暫時未能回收紙包飲品盒。其他紙包盒在校園範圍的回收箱，暫時不能賺取獎賞或回贈。



▲「師兄入樽」示意圖

邀請我一起清理垃圾的老鬼

從前我在學生活動中，甚少為其他人收拾垃圾、清洗後再乾淨回收。如果那次我自己回收垃圾，下一次我不在場，其他人也只會繼續製造大量垃圾，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而且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只有我一人在意，我感到十分無力。

一次學生活動中，大家如常大吃大喝，遺下一大堆玻璃樽、膠樽、鋁罐和其他即棄用品。一位同樣是環保 L 的老鬼邀請我跟他一起清洗可回收的物資，方便他把回收物帶走回收。兩個人在洗手盆前有講有笑、一起為乾淨回收努力，原本的苦差忽然就輕鬆不少。

我們收集回收物期間，有同學說：「多謝你們為環保出一分力。」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實人人也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你也可以！」也有人問：「原來回收要先清洗乾淨嗎？平時在街上看見回收箱，不可以直接把鋁罐膠樽扔進去嗎？」這些對話，成為了改變其他人行為的契機。

改為堂食的朋友

大學生多有合群焦慮，生怕言行稍為出格會被視為 Kam L，環保 L 當然也不例外。一開始我也在環保 L 的群體外收起自己的環保習慣，例如大家要點外賣，我也沒有異議，跟着一起下單。後來我決定在不影響人的情況下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大家要點外賣，我就自備餐盒和餐具買外賣一起聚餐，也沒有人會說甚麼閒話。

久而久之，大家也習慣了這樣的相處模式。一次獲邀到一位同學家裡玩，一行五人先到樓下打冷，再上門酒聚，我還事先訂購本地種植的有機車厘茄造訪。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四人聚會從來都是在那位同學家裡點外賣，那次卻因為擔心點外賣我會不高興，改為堂食。現在他們發現，堂食其實也不錯，不用付運費，也不用處理垃圾。

真正的朋友不會取笑你的原則，甚至會因為你日常的堅持而嘗試改變。



後記

本來獲邀稿時，這篇文的代號是「屌大學生唔環保」。後來我們又考慮過寫一篇專題，探討上莊時如何運用學生組織的公權力搞環保，例如千人宴大笪地找 ReCube 租借活動餐具（而且有一條龍運送和清洗服務）、宿生會搞退宿回收、迎新營減少設計新 T-shirt、畢業班 Photo Day 用其他可重用裝飾取締波波橋；不過，若然不在其位的我們對學生活動指手劃腳，相信效果遠不如同學在自己的崗位上多想一步。這一篇，希望讓大家看到開始實踐環保的方法，而環保人也可以看到同行的彼此。

在我看來，中大現在缺的不是重視環保的同學，而是讓環保同學看見彼此、凝聚力量一起去做些事的機會。如果同學沒機會參與伍宜孫 Green Team、中大農發、MOCC 大使、流水山城等學生活動，一個人還是可以在日常裡連結其他環保人，甚至影響身邊的人。



組織前言

▲ 民主（牆）總是有光

在中大學生會還沒解散前，以往的迎新特刊都有介紹中央三莊（幹事會、學生報和校園電台）和代表會，除了嘗試讓同學了解他們的工作外，亦探索學生組織工作時常面對的問題。筆者在沒有學生會的時候入學。無論是報社過往的刊物和記錄，還是前輩口耳相傳的故事，似乎都對學生組織添了幾分批判，亦添了幾分理想。

我們無法想像有學生會的時代。缺少了這些組織，失去的到底是什麼？事實上，除了參加學生活動的權利，其實還有實踐和組織的經驗。〈喺學生會學社群自治〉透過分享在學生會工作時的經驗，說明社群自治的可貴之處。

校園內，即使校園氣氛低迷，但有志之士仍然存在。〈長風破浪會有時——訪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除了跟進學生會的重建進度外，亦嘗試了解成員選擇協助重建的故事；〈如常在苦困裡彰顯——訪學生代表 Justin〉則深度訪談了一位在中大學生會解散後上任的學生代表，講述他為何在校政氣氛低迷下仍然選擇參選學生代表。

〈Indie 仔，趁青春、艱險奮進，結隊搞騷吧——訪山城音樂節 2024 搞手〉訪問了山城音樂節的搞手，了解理念和波折外，亦留下對未來學生活動的想像；〈報 2024 社自白〉則為編輯們嘗試剖釋自己內心狀況，透露自己為何在沒有資金下仍然堅持留下來，同時也是編輯們出版時的心路歷程。

喺學生會學社群自治

【原刊於大學社區報迎新特刊2022】

文 / 楊政賢（2011-12 年第四十二屆中大學生會會長，從事道德時裝與勞工權益工作，曾任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主席）

就算在最自由的年代，學生會在中大建制內的權力都很有限，只在校董會、教務會佔一個席位，或是有少許財力可以獨立辦媒體辦活動。校方趕絕了學生組織，不只是傷害同學建制內的權力，更是剝奪學生自治的空間。學生之所以要自治，是因為社群內必然會出現利益和價值的衝突，通過學生組織，我們可以學習建立共識處理衝突，建立符合眾人理想的社群。學生實踐過自治生活，也更大機會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謝謝學生組織這個載體，讓我有過這些空間和實踐。



這幅相，剛好是十年前我卸任學生會幹事會前拍下。當時的幹事們趕在換屆選舉前，整理了一年下來的工作報告。同學普遍對學生會事務冷感，為了盡快派出三千份工作報告，我們在崇基週會前教堂外佈陣，邊派邊喊：「想知學生會會費用咗去邊，可以睇下呢份報告㗎。」短短十五分鐘內，就派掉了一百多本。

同學最關心那八十七元會費的去向，反映出學生會面對的認受性問題。差不多每屆的學生會幹事，都受過類似質疑：「其實我不在大學本部上學，享受不到你的服務，那為什麼要收我會費？」以及最難答的「點解迫我做會員，無得退會？」必然會員制下，每個中大本科生都自動成為中大學生會的會員，擁有投票、被選、議政和享有學生會福利的權利。雖說是權利，但在不少的同學眼中，必然會員制和會費卻是強加的壓迫。

學生會會費及政府稅收有相似之處；必然會員制與國籍與公民權的設定同出一轍。所有的政體和政治社群，都面對令人頭痛的認受性問題。幾乎所有現代人呱呱墜地那一刻，就成為某國公民。國家默認公民要遵守規則法律，又默認他們定期繳稅貢獻國家，不願遵守既定制度的人只有一個下場——被國家和執法者用武力制服。可是政權都了解到，單靠武力是不能長治久安，因此它們又開發了新的途徑來鞏固認受性。社會學家將這些途徑歸納為數類：傳統型，例如君權神授；魅力型，要人們狂熱地崇拜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法理型，民主憲政方式吸納民意；以及績效型權威，用經濟發展或軍事勝利來維持人心。

學生會無神權又無魅力，唯有採取後兩者，民主及績效來確立認受性。過去五十年來實踐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鄭廣恆同學在 1973 年刊出的《中大十年》寫道：「不少校內同學對參議校政抱消極態度……改革校政合乎同學要求的預期效果，只倚靠一兩個態度積極、意識高漲的學生代表的單方面努力，又焉能有成？」

「學生代表負責反映同學的意見，替他們爭取；而廣大同學則是學生代表的背後支持力量。但經驗告訴我們：同學似乎不大重視這方面的發展……間接地則使到學生代表有挫敗感。」1980 年的方旻映同學在《聯合山城》亦有類似觀察，她是後來的大中學生會副會長。

參選學生代表的同學，大多在上莊時帶著一堆願景和政治議程——有些想改革課程、推動學校對工友小眾的友善政策、推動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但一年的工作中，更多時候是要絞盡腦汁引起同學對學生會的關注，配合福利、校政、社會參與來肯定學生組織的存在意義。我那屆的學生會爭取過的「績效」有校巴改革、課務安排、學生債務、還有反國教罷課等。自覺做了很多卻得不到同學的認同，閒時就會在網上看到「學生會不代表我」的批評，卸任時很有挫敗感。

所有政治社群都有類似的挫敗：無法建立眾人認為公平的制度去做決策、有制度又無法達到共識、有共識又無法順利執行。為了解決上述難題，現代政府開發了一人一票、金權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朋黨寡頭壟斷等工具。但若果這些工具無法奏效，政府最後都會訴諸暴力和強制手段——要麼直接殺人滅口、要麼把異見者關到牢裏，要麼用社會和經濟手段將對方邊緣化。

學生組織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曾擁有暴力強制手段：不交會費的同學，難道找保安組來捉他們嗎？那些認為「宿生會不代表我」的同學，難道宿生會有權禁止他們使用宿舍設施嗎？由於沒有強制手段，學生社群就只能開發非強制手段——將重大決議交諸全民投票、通俗貼地的討論文、或在學生會架構外，以靈活的關注小組等方式來營造共識。由於社群內的精英（例如學生代表）跟普通的參與者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相若，精英亦需要以平等的態度去處理紛爭。在各類社會組織中，沒有太多好像學生組織般每年都要接受民意洗禮。撤除諮詢期間刻意挖苦新莊的儀式外，也沒有太多社會組織像學生組織般，會通宵達旦針砭程序公義和議題。學生社群平等地決策事務，在今日的威權社會下，大學高層做不到，政府官員也做不到。這些挫敗感經過沉澱與提煉，卻可成為可貴的社群自治經驗。



▲「中大反 Starbucks 行動」

我那年學生會其中一個深刻的經驗，就是星巴克進駐中大的爭議。美心集團是善衡書院成立初期的飯堂承辦商，在 2012 年開學前，善衡院方通知同學，飯堂的咖啡店將會出售星巴克咖啡，呼籲同學向善衡學生會表達意見。在收到投訴後，中大幹事會和學生報代表跟善衡學生會會面，陳述星巴克打壓工會及剝削咖啡農等惡行，反對星巴克進駐中大。學生會雖在選舉中得到同學授權，但在 2012 年的時空，星巴克受大學生歡迎。支持星巴克加入中大的同學認為，星巴克的企業道德問題不應凌駕同學對高質素和多元化餐飲的選擇權。

短短兩個月內，支持和反對一方的同學在網上討論、互罵、戲謔，有過數百人參與的諮詢，甚至在校內遊行宣傳。最後，善衡學生會以公投的方式，大比數通過支持飯堂售賣星巴克咖啡。最遺憾的是，那時討論的焦點由原來中大是否應該引入連鎖集團及黑心企業，發酵成中央學生會與書院學生組織的矛盾，抗拒中央組織對書院事務的干預。在那段時間，我為事件失焦感到無奈，因公投結果跟自己的意向大相逕庭而感到挫敗。

我當時不知道，這些經歷不全是負面的。公共事務不是辯論台，不是正反雙方鋪陳各自觀點後，大家就會找得出合理的結果。推廣一個政治議程時，要理解目標社群的文化脈絡與價值判斷的差異；要察覺自己的偏見；要對自己的論點經過多重媒介傳播後失真有所準備；要明白情感與關懷的交流，有時比理性溝通更有效；要追溯人際關係與利益的交錯；以及時勢造成的限制。這些複雜性都在說明，學生組織這種以政綱、選票、討論「正經事」的組織架構，只是營造社群其中一種方法。

如此，當學生會飽受壓制，我們是否可以用去中心、多中心、扁平化、非正常、視覺式等架構和方法去營造社群呢？我相信可能性有很多。

在學生組織出過的風頭、恩怨與挫敗，其實已經湮沒。但我依然把學到的易位思考，累積到我現在以及未來會參與的社群中。而我早年的學生經驗呈現過，平等的政治參與是有可能的。這個可能性是寶貴的。中大的高層沒可能不知道閹割學生組織的手段，就是扼殺同學學習社群治理這門學問。社群不能治理的回力鏢早就打回到他們身上——例如有些院校的 Ocamp 找不到學生協助迎新，為新生準備大學的生活；又例如在防疫政策上，政府、專家只懂用強制手段迫市民就範，結果導致自己失去誠信和認受性，在推廣疫苗上寸步難移。如果人們沒有試煉，沒有空間去實踐社群自我治理，就只會愈來愈多溝通失效和裂縫。相反，想去維繫營造社群的人，就會繼續探索大家可以共存、可以達到共識的方法。

學生自治是民主的實踐，在民主制度缺席的時候，民主就體驗在學生自治的實驗。

長風破浪會有時——



引言

對於新生、甚至是入學已經幾年的同學而言，對學生會沒有什麼認識，且沒有學生會的生活亦已成為新常態。

自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下稱JCSU）2022年時宣布啟動重建，他們的身影亦只每年的藝墟忙掠過，但大家也會疑惑「幾時先會有學生會？」筆者找來現屆的正副召集人，除了解學生會的重建進度之外，亦希望得知他們在重建時遇到的困難。讀者作為未來學生會的一份子（可能畢業都未係），不妨聽聽他們的想法。

受訪者：

Anson（第一屆、上屆及現屆召集人）

Kenny（現屆召集人）

Alice（現屆副召集人）

PakHo（現屆副召集人）

重建兩年 依家係點？

按照四人的說法，2022年開始籌備到目前為止，會章經多次修訂後已經完成。JCSU年初時曾與汪寧笙副校長會面，處理與警務處註冊的細節和一些用字上的問題，及後在五月時遞交已修訂完成的會章予學生事務處（OSA），而他們亦認為該份會章已經準備好呈上校董會。具體來說，會章與之前並沒有太大的修改，但應校方要求，重建後的中大學生會需包括研究生及設有英文版的會章、同時須向警務處獨立註冊。

因最終的學生會會章須得到校董會承認，到時可能須考慮校董會的意見再修改，但校方強調會章由學生主導；而JCSU原本預計修訂後的會章可以於本年度六月呈上校董會，通過後便能諮詢學生及公投，但校董會見傳媒時未有談論任何關於學生會的事項，Anson估計校董會當時因為專注處理校徽事件，未有時間處理其他事項，因此未能繼續下一步的行動。

「喺重建方面，學校或者JCSU會唔會有一個重建嘅 Timeline?」

他們坦言JCSU處於被動位置。OSA雖是他們與校方聯繫的窗口，但因架構的問題而導致校董會上的資訊傳遞較慢。目前校董會仍有五席未有產生方法，Anson認為校董會會優先處理校長遴選和三個持份者校董（學生、教職員、校友）的產生方法，因此校方和他們都沒有明確的時間線可以告訴大家何時能夠諮詢、公投，甚至是何時才會有中大學生會。

訪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

文/ 中大學生__

訪/ 中大學生__、縮細狒狒、迪

應有之物

校方歡迎學生會的重建，但Anson對重建的擔憂是：不少校董會的成員剛上任，他們對中大的了解有多少？又或者更直接的問題是，校董會有多少成員都同意應該要有中大學生會？即使於校董會獲得通過，但對JCSU而言，仍須面對向同學展開諮詢、以及公投通過新會章的問題，對學生來說，又有多少學生認同學生會應該存在？

Alice坦言，如何令學生明白中大學生會的處境，為什麼要有中大學生會，這些都是他們未來要面對的問題。他們直指他參選幹事會時的傾莊人數較少，而今年在JCSU內的成員[1]人數（25人）亦較往年（34人）少了很多，選舉時Year 1的同學亦只有兩位（亦即Alice & Pakho）。Anson補充說：「今屆逸夫民選中代同崇基民選中代補選嘅選舉都唔過門檻，大家對中代有咩認知，呢樣可以喺投票上係反映到出嚟。」

他們明言傳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點樣去傳承依件事係好困難，對FM嚟講，或者好多Year 2 Year 3嘅同學，佢哋唔係太明，又或者唔係太care有冇學生會。」「可能會問：『點解要投返呢個中大學生會出嚟？』學生會點樣去適應返呢個時代都係一個問題。」

而宣傳方面，雖然每年有藝墟宣傳JCSU，不少中大屬會亦會向他們查詢藝墟招攤的詳情，而大家會派發關於學生會的場刊供學生了解，但Alice認為因藝墟比較娛樂、迎新向，所以在宣傳學生會方面非常困難。

「依個係無可厚非嘅，始終我哋有咩行政上權力，冇得借場俾人，完咗藝墟就有得聯繫大家。」

無法避開的 獨立註冊

Anson對重建亦有另一層隱憂，因目前JCSU的組成方法與以往代表會的組成相同，上年敬文學生會仍有向JCSU派出代表，惟今年因獨立註冊的問題停運，及後亦沒有代表可以派出。Kenny和PakHo稱在書院方面，卻感受到處處強硬的作風，學生會的存在並不受歡迎。「一係註冊、一係冇學生會」，「JCSU做咗兩年嘅事，但書院想喺半年就做好，會章未諮詢好，實務上嘅嘢未傾好。」若書院強逼獨立註冊，或令多間書院學生會解散或是停止運作，都會導致重建進度落後。

時代紛亂 卻踏步前行

當我們問到四人為何協助重建，留下來幫忙有什麼意義？他們都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Anson在21年入學，學生會在入學不久後便隨即解散，後來他當選了逸夫學生會幹事會的會長，亦當然地接觸了更多關於中大學生會的事。

「嗰陣咁啱上咗一個不存在嘅代表會，雖然書院SU會管Canteen，但大學都有好多Canteen，就算唔講其他嘢，大家都要食飯，有返學生會確保到學生嘅意見可以Voice Out到出嚟，喺唔同Level都表達到意見。書院自己有，咁好明顯大學都要有啦。「冇咗中大學生會，一定係有啲嘢俾人忽視咗。」

但對其他三人而言，或許入學後才知道學生會的來龍去脈，他們又是為了什麼？Pak Ho在23年入學，而Anson是他在O Camp時的組爸，跟他說了很多關於中大和學生會的事情，而他亦希望為此出一分力。

「中大近呢幾年有好多轉變，有好多嘢消失左，我好想搵方法守護呢個地方，唔想呢個地方改變得咁快，知道中大學生會曾經一直為學生發聲，為學生爭取權益，實踐員生共治嘅精神，而唔係校方對學生上至下嘅管治。有左中大學生會好多野都有左，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重建學生會，守護中大嘅精神同埋價值。」

Alice 同樣在 23 年入學，今年亦同時是逸夫學生會幹事會的會長，形容自己是被學生會人的特質吸引。「咁當然係學生會，特別係 JCSU 做咩嘢其實唔係好見到個效果。除咗 SU 圈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明白你做緊咩乜。而我會話係被上學生會嘅人嘅特質吸引，學生會嘅人會有稜角，又唔會吝嗇自己嘅意見，雖然傾莊聽落好悶，但如果一個地方係需要改變嘅話，係需要有人去做依啲改變出嚟。」

而 Kenny 在 22 年入學，曾在書院學生會和政政系會擔任職務，他對一個擁有學生會的中大存有想像，指出書院學生會越來越少人，希望繼續做下去。

「對我自己嚟講，留低嚟到最大嘅意義係我都會想見到一個完整架構嘅中大學生會出現，有返幹事會、電台、報社出現，出現返學生管學生嘅狀況。亦都想體現到學生自治的精神，而唔係要向 OSA Reg Soc。同時越嚟越少人去學生會傾莊，中代人數越嚟越少，依啲嘢都驅使到我繼續做，依到要人去接住依嚟嘢。」

Kenny 雖然表示一開始上莊是為了不讓自己冷落下來，沒有打算承接這麼大的責任，但自己卻不希望因此一走了之。

「一方面入到嚟中大，入到嚟政政，就想做返啲嘢，唔想俾自己冷落落嚟。咁當然之後我 take 嘅責任同我一開始上莊初期嘅原意已經唔同。」

「雖然好多責任突然強加於我身上，例如政政要重組 ... 要跟 SU 嘅獨立註冊，上莊前同上莊後做到嘅嘢已經唔同咗，即使未必做到預期要做嘅事，不知道哪裡來嘅責任心會令我想繼續留嚟到，做返仍然可以做到嘅嘢，如果依家走咗，我應該會更加唔舒服。」

* 後記

訪談期間，四人亦有訴說這些年來擔任學生代表的一些心聲。礙於文章結構所限，無法在此跟讀者分享，但大家也是機緣巧合地成為被時代選中的孩子，背上不少過重的責任，希望在校的讀者除了多參與校政事務外，遇見他們時不妨多加鼓勵，說一聲加油。

最後 有冇咩咩想同新同學講？

訪談尾聲，Anson 用「見證」來形容自己這幾年來的經驗，見證著舊時代的轉變；見證著 JCSU 的誕生；見證著新同學加入。我們邀請四人對新生說些話，Anson 表示自己即將畢業，希望這番說話交由他們三人交代。

Alice：「希望新生即使有諗過做學生會，但都留意多啲中大嘅事，唔好只係沉醉嚟自己圈子，了解下周圍發生緊咩嘢。」

Kenny：「希望新生入到嚟唔好當一切係理所當然，依家發生緊嘅好多嘢隨時會消失，呢啲嘢其實係好多人喺背後爭取同守護緊嘅價值。關心多啲中大同身邊嘅事，未必需要好貼身參與，但持續監察，持續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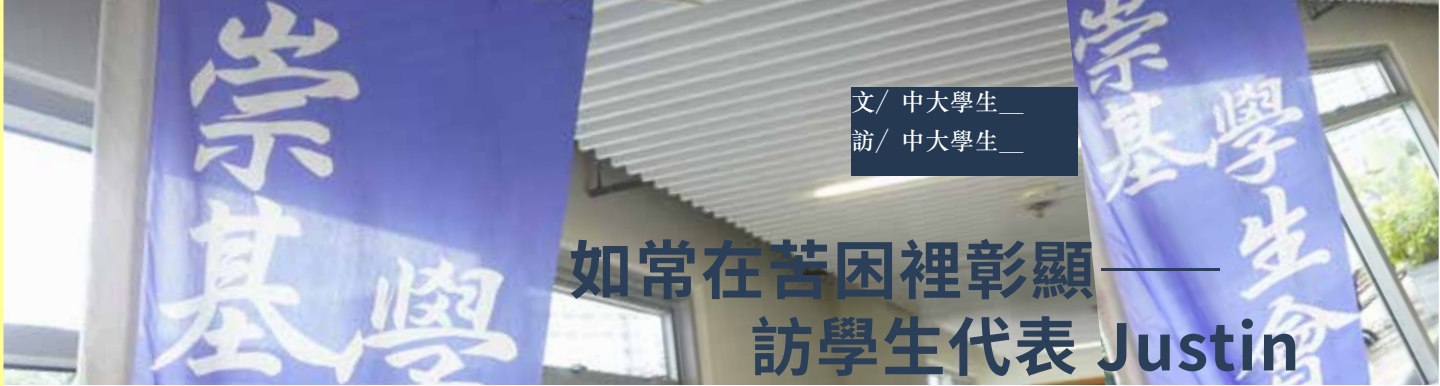
Pak Ho：「希望新生多啲去了解中大嘅曾經發生過嘅事，好多嘢都同自己息息相關。至少嚟中大，有好多歷史唔講就會被抹滅。」

結語/ 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authority

埋稿之際，校董會已通過任命盧煜明為新一任中大校長，同時亦打聽到各大書院幹事會的招莊並不順利。候任校長盧煜明稱未來會協助重建學生會，亦希望在今年內可以見到修訂後的會章；校董會主席查逸超則明言期望五位校董能夠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加入校董會，若本科生校董的產生方法沿用中大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席位，相信很大機會能在來年再次看到學生會，但其他校董又會否支持重建學生會？而下屆各書院學生會會否斷莊，導致重建進度落後？這些仍是未知之數。即使是重建之後，相信以往的恆常議題「學生會不代表我」、「學生官僚」亦會出現，但這也是之後的事了。

* * *

[1]：JCSU 的成員構成由以往的中大學生會代表會組成，簡稱中代。各書院學生會需向中代派出代表，代表可由委任或民選產生。



學生代表，除了大家熟悉的書院學生會（大多指幹事會），還有在校園內神秘的角色：書代（書院代表會代表）和中代（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代表，套入現在的時空則可理解為 JCSU 內的成員）。每次的週年大選，我們總會看見有些人在闡述自己的政綱，邀請大家「拎張睇吓」，問大家投了票沒有，但不少人對選舉沒太大的興趣，瞭解不多，於是一走了之。以往週年大選的投票率本已不算高，不少都是勉強地過了門檻。特別在經歷學生會解散和疫情後，學生參與校政的氣氛更是低落，而急劇轉變的環境亦導致學生代表在校政上的聲音處處受到壓迫。

認識 Justin 之初，是在女工特更的時候，那天是我第一晚當更，那時我還未算認識他，只知道他有學生會幹事的身份（和被休學了）。完更後和他走了大半個中大，順便吹了一晚水，也對他有個大概的了解。一直以來，我覺得學生會/ 學生代表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編按：好似做報社嘅人仲吃力不討好），原因當然是和同學關心的東西並不一樣。每次聊到校政和社政，他總是能夠滔滔不絕；每次走過校園的某個角落，他似乎都能說得出這些東西在他眼中有什麼問題；每次書院內發生了什麼事，他總是能在 IG 上出 Story 通知大家。如今他畢業了，我們又能否透過他了解什麼是學生代表？

從理念到實踐

Justin 在 19 年入學，他指其實在入學面試的時候亦有向教授提到想參選學生會。「嗰陣嘅社會氣氛，見到好多學生會嘅人好願意為社會付出，唔同學生組織都會用佢哋嘅影響力希望同學關心身邊嘅事。」後來中大暫停實體課堂，令他一直將參選學生會的事情埋在心裡，他亦見證過朔夜總辭、及後中大學生會解散的過程。這幾年間，他提到最大的經歷是慢慢感受到大家的公民意識下降，不再關心社會發生什麼事。

「喺佢哋宣佈解散嗰陣，個感覺就係：『仆街冇喇，以後乜都有喇。』」

大學生的身份似乎永遠離開不了「關心社會」，在歷史上更出現「火紅年代」[1]。而過去數十年，亦有無數的大學生投身社會運動。Justin 指出現在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就是「讀好啲書」，但他卻認為既然我們是以公帑去深入探究自己學科的知識，理所當然就要將自己學到的知識回饋到社會上。

人際關係上的機緣巧合亦令他接觸了不少學生會的事情，他的組爸和組仔都曾經是學生會的一員，但最後令他決定參選的原因是在 22 年的藝墟，那時他擔任藝墟的執委，負責看守救護站和派發場刊，派發場刊時同學的反應令他深受感動。「當然唔同嘅同學有唔同反應，有啲同學可能真係唔會點理，但最深刻嘅係之後有好多同學好 appreciate 有班人嘗試努力去起返一支中大學生會出嚟。」這次之後，他決定去參選書院學生會，那年他是 Year 4。

Indie 仔，趁青春、艱險奮進，結隊搞騷吧。

序

2023 年 3 月 17 日，《序弦》山城音樂節在新亞小百萬舉辦了。那晚，我前面有位男大學生聽住歌拿着啤酒，哭訴著自己剛剛失戀，我前後的觀眾一邊安慰他「下個更可愛」，一邊不時分飲他手中和放在地上的啤酒（我都有搭吓膊頭，但唔只係為咗啤酒）。漂 CD、Album 介紹、分享 Playlist；有人 Mosh 到甩了隻鞋，然後大家大叫「邊個跌咗隻鞋！」同時繼續 Mosh；臨完場朋友都上台插水了幾次，表演的樂手和主唱在演出後就落合同學生、觀眾撞成一片。這是上屆我參與山城音樂節的回憶，雖記憶朦朧，但我肯定那晚觀眾和表演者都能盡興。

今屆，大家引頸以盼的《生性》山城音樂節（下稱「山城」）在九月二十日和聲書院 LG2 Dinning Hall 舉行。但想必大家都會好奇，為何這次會延遲，不像上屆在三月份的新亞小百萬舉辦？我訪問了五位今屆山城音樂節的搞手——Dennis、Wilson、Ivan、Woody、Jonathan；希望了解他們想通過舉辦山城延續的理念，在今屆籌備過程遇上的波折，還有經此一役後，對於未來的山城，中大內學生活動的思考。

山城音樂節是個學生自發組織的一夜音樂節活動，上屆搞手 Wilson 和今屆主席 Dennis 指，今屆山城承接往屆推廣本地獨立音樂的理念，藉免入場費及強調「自由定價」的形式，一方面希望吸引未接觸過香港獨立音樂演出的同學親身一試，同時讓觀眾付出自己心中感到值得、可負擔的價格支持音樂圈。

書院「揸正嚟做」——校外觀眾與觀眾紀律問題

2023 山城《序弦》成功吸引到很多同學和校外觀眾的讚許，享譽香港獨立音樂圈，但可能在提供場地的新亞書院眼中卻是臭名昭彰。

至上屆 2023 年為止，山城仍是新亞書院屬下的學生活動，由新亞學生會提供資助。在籌備初期，搞手們希望照舊借用新亞的小百萬作今屆活動場地，但由於往屆觀眾紀律違反場地秩序的問題，遭到供應場地的新亞書院拒絕。2023 年的山城搞手 Wilson 提到「其實上年我哋都有採取一啲措施，我有上台叫大家唔好食煙啦。都有寫一塊大牌，提醒吓大家唔好食煙啊，但始終係戶外場地，啲觀眾情緒到嘅時候好自然就……發生咗。」

Dennis 說，在申請今屆場地與院方交涉時，書院一開始便堅拒借出小百萬。書院職員提到上屆活動次日仍有煙味殘留在小百萬旁邊的人文館內 [1]，Dennis 補充書院拒絕的其他理據是認為「呢個活動唔單止唔係搞俾新亞學生，甚至唔係主要俾中大學生，咁呢個活動憑咩係用新亞嘅資助同場地？」，而書院另一點理據則是，在騷前準備樂器和設備時校音及試音造成的噪音，無可避免會影響相鄰的人文館上課和誠明館辦公，而且亦會佔用作為主要通道的小百萬。

花果飄零 曲折離奇

至此已經是 23 年 11 月，他們知難而退，為了向其他書院或部門其他場地提出申請，唯有脫離新亞屬下活動的名義，以未正式註冊團體或者搞手所屬的書院樂隊名義再申請。

首先是聯合書院，但還是遇到類似問題，最終他們多次修改，再向學生會提交計劃書後仍然不果，只好再轉移目標。

再來已是 4 月將近 Exam Period 的時期，Woody 等人去到崇基學院的辦公室提出活動申請，他們感覺崇基學院的職員對活動比較開放，只是提出了「活動的籌備工作需要崇基樂隊的參與」一個條件，Ivan 笑說「可能山城個壞名聲未去到山腳嘅書院」，但最終因為樂隊同學對加入籌備工作的意欲不大，加上人手有限而遭到拒絕。

他們同期找到學生事務處（OSA），希望趕在暑假前舉辦。當時 Dennis 上到辦公室，一位職員幫助他們提交租用文化廣場的申請，更在當日便盛情引導他們熟悉申請場地的電源位。Dennis 回憶「職員當時甚至話我哋搞騷嗰日係禮拜日，就算嘈啲都唔洗驚。」但弔詭地，後來同一位職員口風急轉彎——「嗰日係禮拜日，所以唔 Book 得。」

如常在苦困裡彰顯 未會變

說到距離感的問題時，Justin 指同學當然和學生會有距離感，但他卻提到作為學生代表，需要主動去找同學，而不是讓同學來找你。在他離任前的一段時間，書院不斷停水，而他的任務就是每天去關心有沒有停水的狀況出現。「有嘅我就會去出個 Story，話返俾大家聽：點解有水？幾時會有水？未有水之前，大家可以去邊到處理日常需要？有時 EMO 通告未落到宿舍，我都會出 Story 提醒大家。」

「同學有困難，佢唔係真係咁易去搵你，或者講到出嚟。學生會做嘅嘢就係服務學生，關心多啲同學嘅需要，Care 食飯 Care 校巴。」

他亦提到因為自己作為學生會幹事的關係，令他可以閒聊時與同學提到不少校政和社政的話題。「因為同學知道我上學生會，有同學因為對 Canteen 唔滿意，佢會主動影相俾我。咁如果我冇上，佢可能有唔滿意都唔知點。」

他認為可見的將來下，學生組織的壓力無論在有形抑或無形的情況下都會倍增，但他仍希望未來的學生會，或是其他學生組織，都要將學生的權益放在第一位。

最後 有冇啲咩想同新同學講？

「雖然好多人，特別喺中學生嘅時候只係諗住考好 DSE，而上到大學又有大學五件事，咁但係依啲又係唔係你嘅目標呢？我唔會喺度推薦大家去上學生會，但你覺得有嘢要有身位先可以做，你可以考慮吓上學生會，喺過程中可能你好努力但有結果，好老土地講一句：諗清楚自己想做的嘢，趁住依幾年大學，努力去做吓。」

* 後記

訪談期間，Justin 多次提到學生代表的本質就是服務學生，雖然我與他的相處時間不多，但在我眼中，他就是一個持之以恆地影響身邊同學的人。直到此刻，Justin 每天仍有在 IG 上分享我未必有留意的新聞。以往學生代表往往脫離不了距離感的問題，但相信以此為起點，我們對學生自治的未來能有更多想像。

他一直希望同學更加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因此參選時的職位是社會部幹事，他指這個身份在當時比較敏感，會章上指明社會部幹事需要負責「社會及時事之研究及行動」，令學生會不能變一支普通的福利莊，但他明言希望藉此身份令更多同學了解世界的不同面向，「如果我可以喺 SU 嘅 IG 上面 share 一啲新聞，咁咪會好多人睇到？」Justin 及後亦有以民選代表的身份去參選中代（即 JCSU），但形容當時並沒有什麼定位可言。他提到參選的目的從來都只是藉選舉去宣傳 JCSU 的存在，「會想藉參選去話俾大家知，原來中大仲有一班人，為同學好，為佢哋信念又好，睇吓會唔會鼓勵到一啲人去到我哋一齊做依件事。」

理想的學生代表形態

當筆者問到為什麼以民選的方式上任，Justin 提到並非只有中代，即使自己在書院代表會中能以委任代表的身份上台，但他仍要堅持以民選代表參選。

「過去幾年崇基代表會都係委任代表，我好堅持民選嘅原因係希望透過選舉嘅時候，令同學知道咩係代表會，有咩可以搵我哋代表會，你投票俾我，我會點樣去監察 Exco[2] 點樣做嘢，學生會作為權力機構，點樣確保到權力唔好濫用好重要。」

「好似之前浸大學生會，有人穿櫃桶底，令到八十萬唔見咗，依啲都係有監察嘅狀況下會出現嘅嘢。」

Justin 亦提到之後成為代表會內的章則委員會主席 [3]，除了修改會章內有問題的地方，同時將代表會的司法權由代表會裡抽出，產生監察代表會的機制。「如果代表會係監察幹事會，咁邊個走去監察代表會？」

[1]: 指大學生之間的政治氣氛十分熱烈，學生運動亦發展蓬勃。
[2]: Executive committee 的簡稱，即大家通稱的學生會。
[3]: 負責審訂學生會的會章，並建議代表會作出適當修改。

Dennis 續說「再之後係話我哋唔可以用某書院樂隊名義。到後來佢有覆 email，就算數唔再搵佢。」

曾在英國大學讀書，研究香港獨立音樂的音樂人類學博士學生 Jonathan 提起在英國大學搞騷的情況 [2]，失笑地說「其實佢哋（該英國大學）好簡單嘅，佢哋想 Book 場搞個騷，係有個 Online system 去 Book 場嘅，咁佢哋就要牽涉一啲 "Health and Safety" 嘅要求，有曬一個 list 咁逐個剔，咁總之剔曬所有嘢，要求就滿足曬，咁就已經可以搞。」

幾經波折 生性回歸

山城的戰勝歸來是反高潮的。4 月底 Dennis 在因緣際會間去了一場「考試加油站」炸雞聚會中遇見和聲學生會的 PakHo [3]，很自然地談到山城的場地困阻，適逢柏豪對香港獨立音樂亦有熱誠，便做了書院和山城搞手間的推手，而且和聲書院方亦希望有更多活動讓走讀生對書院有更多歸屬感，於是亦願意提供場地，幾乎一拍即合。最終竟然是在一餐炸雞推動下，他們回來了。

Wilson 回想 2023 年山城的時間背景，上屆山城恰巧遇上強制口罩令剛剛撤銷 [4]，情況好比鬆開緊勒的橡筋。「再加上嗰陣 20 年到 22 年都有搞到山城，冇前人交接啲嘢（注意事項），而我哋又對食煙問題唔敏感，冇意識到可以咁失控，（冇表明到嚴禁吸煙）導致有少少破窗效應咁，所以呢個位其實係要認錯嘅。今年其中一個關鍵位係我哋內部應該要強硬啲」Dennis 接着幽了一默——「邊個食煙，就大鳩佢『我哋唯有同中大保安合作！』」

經此一役，他們將今屆 2024 山城活動定名為《生性》；見過鬼也會怕黑，「生性」也是希望保護山城音樂節能夠延續下去。

獨立音樂曝光

「感覺好嘈。」Woody 曾問過新亞院長怎看待上屆的山城，記得當時院長第一時間的反應如是。「可能喺大部分管理層、職員眼中單純覺得呢個係製造噪音嘅活動，唔知咩嚟。」他說。相信這類印象也在反映社會大眾和獨立音樂圈之間的關係縮影。

Wilson 形容推廣獨立音樂像要面對一個難以突破的 Bubble。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的樂迷各有各玩，很少有機會讓圈外人欣賞到另類的音樂。但他相信總有個突破位——「幾時人會知道獨立音樂騷嘅價值？就係當佢哋睇 Live Show Feel 過先知！」

「喺疫情之前，香港八大嘅 Band Soc 都會各司各法搞自己嘅 Annual Performance」，AP 除學生樂隊演出外，亦會邀請校外其他獨立音樂單位，「呢啲大大小小嘅騷對香港 indie 文化好重要，但喺疫情之後，好多學界 Band Soc 已青黃不接，呢個喺大學搞騷嘅角色好似交曬俾 UNISON [5]，咁呢件事就有咗。」Wilson 談起他所見大學獨立音樂 Scene 的變化。

他在思考如何讓人聽到更多音樂，想像以前的校園 Band Soc 文化「佢哋可以喺校園用一個較低嘅價錢俾同學睇到騷，成件事係……比較兜兜啲，但正正係喺大學生呢個夾心階層、黃金時機先可以做到。」而現在山城能夠重新擔當這一角。上屆有不少觀眾聽到《宇宙幽靈》演出後反應很好，「原來，好多觀眾係因為山城而認識《宇宙幽靈》，然後再認識到其他音樂，知道『原來獨立音樂唔一定係轟轟轟』。」

他續說：「呢種 Vibrancy 係山城可以提供到，體現喺我哋嘅 Line up、自由定價理念。所以山城點解咁重要？佢某種意義上免費，喺中大，一個唔係專 For 搞騷嘅校園搞騷，喺小百萬呢啲日常經過嘅空間，咁會接觸到多啲街客（圈外人）同埋中大學生；好多時冇聽開嘅人好難接觸到坊間有咩 Indie 騷嘅場地，其實係一種成本。」Jonathan 亦想起上年的觀察，儘管音樂的風格多元有異，大部分觀眾亦會聽完整場騷，很少聽完某隊樂隊表演完便中途離開。這與很多校園音樂演出的狀況不同。

大學獨立音樂 Scene（場景）的文藝復興 [6]

因為研究題目，負責聯絡的 Jonathan 本身認識不少獨立音樂圈的樂手。學生組織預算有限，搞校園一般都有學生價，Jonathan 提起今年與樂隊洽談演出費用時說：「當我介紹咗我哋係山城，解釋我哋係學生組織，預算唔多；有啲樂隊當聽到係山城時覆：『如果你哋嘅話我哋其實有所謂，最緊要大家玩得開心』。」這讓他們相信很多樂隊都很認同山城的價值。

「我同有嚟過山城音樂節嘅樂手朋友、觀眾傾偈，當佢哋知道我係同今屆山城有關，佢哋都會好直接咁話『上次嚟咗，係好撚正啊』；唔淨止個演出 Line up，唔淨止個場地；唔係 Hardware 上，而係 Software 上嘅一種『正』。」Jonathan 記得朋友曾說上屆山城有一種「想當年」大學 Band 騷一樣嘅感覺。而當年和現在的校園騷是很不同的，他形容那時 "DIY" 好多，而演出樂隊的風格也更加多元。

他回想有些圈中人可能原本會覺得近年大學在樂隊發展上大不如前，但來到山城就會驚喜，或者至少能感到希望，相信未來仍有年輕人會繼續走上這條獨立音樂圈的路、接這個棒，未來亦會有更多對不同音樂類型接受度高的獨立音樂樂迷；他身邊的樂手朋友總對中大有種印象——這裡有很好的文藝活力底蘊，形容那是種累積而成的 "Legacy"，「要令呢啲 Legacy 維持、傳承到，就需要我哋呢種活動。但當然呢啲事，喺校方角度未必可以見到或理解得到。」Jonathan 緩道。

結？—— Vibrancy & Legacy

我最後問起大家對現在中大的學生活動、組織的想法，而這個環境和當初自身期望的有沒有落差。

Dennis 答我「原來畀我想像中好啲。我入學前以為，因為中大學生會摺咗，所以咩都有咗。但當我入學後接觸到咗人；雖然報社（中大學生報）有咗，但班友仲喺度，雖然狀況好靚，但至少我哋而家都俾你訪問緊。」Wilson 接著說：「冇咗 Title，大家仍然喺某個位置默默做嘢。」

入學時抱著中大人文精神想像的 Woody 說，「雖然入學前都預計氣氛會有啲差，但冇諗到會咁差。我接觸、觀察到嘅同學大多都比較個人化，好多都想快手畢業就算，可能大家目標唔同。」因為人文精神的印象，他想像中的中大人會為了集體的目標共同拋灑熱血，但 Woody 觀察到這樣的中大人並不多。

正在 Band Soc 的 Ivan 說自己也感到些失望：「我接觸過唔同 Band Soc，發現中大部分 Band Soc 成員只期望自己夾 Band 出騷；好少考慮搞騷同搞樂器班去幫助獨立音樂圈同服務會員。而好多其他莊都開始掛住飲酒，或者只為宿分，娛樂化咗。」

「未入山城前，我一向對『上莊』嘅印象都係比較浪漫主義、熱血，唔係啲會有回報嘅事。聽大家講完先知道好多莊都唔係咁。不過我都有 Observe 其他莊，似乎好多莊都唔使遇上咁多麻煩，可能只係搞開 sem 飯同燒烤，佢哋搞 Sing Con 都幾順利……年年都可以用到同一個場。當我繼續同呢班小朋友相處時，更加覺得外界嘅人對山城的印象係啱——山城的確傳承到一種對獨立音樂嘅熱情」Jonathan 說。

「好多時做呢啲事係要由理念驅使，但無端端理念邊度會嚟？上莊文化嘅根本在於『過莊』，其實 Freshmen 都係白紙一張，好多時係當你聽同見到前人嘅說話同行動、付出，先能夠感受到呢啲理念嘅意義。大家能夠親身感受，先傳承到落去。」Wilson 說。校園經過疫情數年，而且很多學生組織現在需面對更多限制，當後來者無法看見前人的腳印，不同的學生組織都遇到經驗和理念傳承的斷層。斷層之後，對「如何實踐理念」的想像和熱誠少不免會消褪。

「就算好彩咁有一班人想做事，都可能會遇上好多限制，譬如搵唔到場地、資金。長遠咁睇團火總會慢慢消退，由冇火變得冇咗火。雖然我哋係可以自主決定做咩嘢事，但我哋始終需要配合校方行政嘅要求先實行到。」Ivan 說。今屆有莊員在籌備過程時淡出，或者大家心中都總有團火，只是沒有料到搞這場騷需要拖到延長賽。

大家都希望，大學是個「Trial and Error 的安全網」、「最後的青春時刻」。在這裡也會遇上滿懷熱誠和想像的同伴，而且尚有各種資源。有些事在大學裡做，會比社會有更多空間。「正因為某種意義上，我哋擁有學生紅利，試錯嘅成本冇咁大，先容許到山城可以嘗試多啲理念嘢。如果理想地，大學行政上對學生活動足夠 supportive，畀學生可以嘗試好多事，就會有好多 Magic happens……」

「例如係上年嘅山城。」Wilson 笑說。

- 〔1〕：編按：「大家記得唔好食煙啊，抽煙 BAD！」
- 〔2〕：Jonathan 亦有經營一個叫做「講 indie」的 Podcast，簡介是「一班對香港 indie 有興趣嘅學者用人話講嘢。」
- 〔3〕：「考試加油站」是由和聲學生會舉行的一個 Exam Period 打氣活動，派炸雞「每人限取兩件」。
- 〔4〕：強制口罩令於 2023 年 3 月 1 日撤銷。
- 〔5〕：UNISON 是一個會在香港大專舉辦獨立音樂節巡演的團體、機構。
- 〔6〕：獨立音樂 Scene（場景）指由表演者、場地供應者、觀眾、騷搞手等分享共同音樂品味的持分者組成的共同體的獨立音樂生態。

2024 報社自白

三月十九日早上，我在宿舍被鬧鐘叫醒。簡單地梳洗、更衣、吃早餐後，我便去上課了。上課期間，我感覺到手邊的電話不尋常地震個不停，心想「我應該冇咁多朋友搵我」，便好奇地拿起了電話，驚見有位報社的友好通風報訊，說聽聞校方要沒收報架。當時的課堂還剩下十幾分鐘，我心想「既然係『聽聞』要沒收，即係仲未沒收喇，落堂先再去睇睇」，於是便放下電話。直至其中一個成員傳出一段追逐正被搬走的報架的影片，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我奪門而出，向最近的報架跑去。當天我忘記繫皮帶，要邊跑邊提着褲頭，十分狼狽。事後得知當時在校的成員大多都慢條斯理，正在吃飯的依然吃飯，剛睡醒躺在床上看電話的依然看電話，待看見那段影片後，才去跟進情況。或許我們都低估了校方的執行能力。

報架被沒收，我們惶惶追趕。原本只是用來分發刊物的報架好像忽然多了重象徵意義，亦成了我們的寄託。究竟，我們在追求什麼？

我想認真傾偈！！

Hazel 讀的是人文學科。或許是因為受到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大學生形象耳濡目染，在入讀大學前一直幻想大學中有着不少關心社會、平日會熱烈討論時政的人，而它所選的學科尤甚。想當然地，這種天真的「人文精神」幻想在迎新營中就已經被打破。又礙於學科性質，所學和「關心社會」總是有段距離。系內同儕之間固然會有認真的討論，但主要集中在學科內部問題，時事社政甚少被提及。逐漸地，Hazel 對世事的觸覺變得遲鈍，偏離了心目中的自己和大學生活。

讀了兩年大學後，Hazel 終於受不了這種離地的大學生活，選擇背上一個「報社成員」的身份標籤，鞭策自己緊貼時事，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他不只希望自己能走下象牙塔，更希望能透過出版，吸引同學走下各自的象牙塔。對它來說，報社是一個可以讓人不流於社交媒體上的口號式發言和互相漫罵的情感宣洩，靜下心來認真討論時事社政的地方。

比起以前，現在中大能聚集同學一起討論的地方很少。Kay 認為報社是一個很獨特的平台，「大家一齊聚咗傾咁多嘢，會思考，會生產到自己嘅結論出嚟。」這種討論不止發生在我們內部的稿題會中，也出現在報社的活動中。大部分莊的傾莊純粹是為了成莊。報社的傾莊卻是為了「傾」本身，每次都討論不同社會議題。對不同議題的討論，在現在中大的學生組織，甚至坊間的公民團體中似乎亦不多。逐漸害怕寫文的 Kay 說自己想多舉辦校史團、放映會等活動，讓大家認識不同議題，然後不斷鼓勵大家討論，厲害點的說法就是「重燃議政氣氛」。

2024 報社自白 —— 追逐報架的人，你們在追求什麼？

文 / 不學巫術

我哋唔係專業記者，我哋唔需要中立～

作為新傳學生的 Agnes 坦言最初想加入報社多少是被虛榮心驅使，但同時也希望在此彌補某種缺失。他在課程要求下參與了系內由學生主導的刊物的出版工作。「一個專業記者所寫嘅每一隻字都要根據受訪者所講嘅內容，唔可以加入自己嘅意見。」正在接受專業記者訓練的他自然也受此規矩束縛。「但我有時其實好有意見，如果呢啲意見受訪者講唔出，我就點都寫唔到。」「譬如加學費，可能我問好多學生、好多大學教職員，都唔會有人好大聲咁講呢件事唔合理。」這令他在系內寫的報導和他想寫的文章之間總存在着一段落差。

Agnes 認為大學社區報和其他傳媒很不同，他可以在這裏寫他想寫的文章。一段前人留下的報社介紹開宗明義地指出報社「拒絕以客觀中立為名，掩蓋媒體自身的立場。」況且，加入報社的同學來自不同學科，當然大多未受過記者訓練，沒有將「中立」奉為信條。

另一位成員如沁有次和朋友分享自己在報社寫的文章，對方聽畢對他說：「你既然係報社入面，咁你梗係要寫啲尖銳嘅嘢。」原來在外人眼中，報社一直以來都有着嚴厲針砭時弊的形象。他事後對我們自嘲般說道：「我哋咁保守做咩！？」報社的文章大多都帶有作者自己的價值判斷，或許更滲透着入世未深的狂妄。但既然我們還未被社會磨平稜角，當然要趁青春大放厥詞！

我要自主！！

如沁在入讀中大前早已聽聞過中大學生報，知道這是一個由學生自主編輯出版、存在了超過半世紀的媒體，因而萌生出「入去沾下光」的想法。可惜中大學生報已收皮，只好加入大學社區報。

如沁讀的是數學。他說讀數學有種被老師將知識灌進自己腦袋中的感覺，自己則機械式照單全收。當中並沒有他的想法，好像沒什麼意義。他想找機會表現自己的努力，自主地成就一件事。而報社就是一個可以將他的想法發表出來而且被人看到的平台。「我唔知道嗰篇通識嘅文寫得好唔好，但至少係我會感到自豪嘅作品。」



報社一直沿用集體編輯制，每位成員的話語權都是平等的，沒有人的意見可以凌駕他人。當有人有想寫的稿題時，他需要說服其他成員他的稿題值得被寫。說服他人的同時也是在說服自己。藉此，我們的自主得以顯現，亦確保了最終成品是自己的。此外，報社拒絕投票式民主，多數派亦要以道理說服少數派，找出分歧的理由，而非以票數壓死他們。重視討論和共識的代價是極長的會議時間，但這是尊重所有人意見所必然帶來的陣痛。而這種民主共議的嘗試亦是報社的可貴之處。

我想陪你游苦海～

有人在報社是為了成就自我，也有人是為了「共渡時艱」。當被問到「點解你自己會留係報社」時，Mandy 回答道：「我真係答唔到，如果我已經諗通答到，可能我就已經走咗……我覺得我有責任心，我最怕嘅就係責任。」

Mandy 回憶起他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做一件事時，很多時候也未至於覺得那件事非做不可，而只是在做那件事的人剛好是他認識的、欣賞的，就自然地不想要他們獨力支撐。「我唔係一個有能力『擔大旗』嘅人，但如果有人係跌咗落苦海嘅話，我都一定係會跳落海陪大家。」

我相信文字嘅力量！！

Mandy 曾經問 Hazel：「你相信文字嘅力量嗎？」點頭好像很中二病，搖頭又好像潑對方冷水，Hazel 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如今回想起來，它覺得決定留在報社的同學應該多少也相信「文字嘅力量」，相信自己的文章可以改變些什麼。

Agnes 有些東西想要改變，有些議題想要推動別人關注。自問沒有能力擔任學生會成員的他相信一個不隸屬於書院的報社會有更大影響力，可以助他達成目標。他說：「我好天真，我真係期望學費呢篇文可以發揮啲作用。」然後又激動地說道：「我哋成個中大有咩人討論加學費，到底發生咩事？我真係好唔能夠理解……以前嘅學生會一定會扁到飛起。」

部份成員帶着「我唔講就冇人講」的自覺選題和寫文，又覺得「報社嘅身位好獨立，我們依家唔係建制入面，但又可以推動校政嘅改變。」這或許自視過高，但「要令世界變得更好」的責任感無疑是報社得以苟延殘喘的動力之一。

我唔想報社死係自己手上 orz

Kay 在加入報社後，翻閱了報社前人留下的文字，得知了報社的前世今生，對前人關心社會的態度和認真討論時事社政的文化深感認同。他堅定地說：「無論之後嘅人點都好，我覺得呢件事值得保持落去。」如沁是個樂觀主義者，相信中大學生報始終會歸位，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空窗期中倣效其角色。

記得我初次來到報社傾莊時，前輩跟我們說報社的傳統是對抗商業掛帥的論述，是關心基層弱勢，是左翼。如今反思，這或許沒錯，但似乎太籠統。歸根究底作為一個由學生組成、流動性極高的學生組織，報社是由當刻的成員一同塑造定，不應僅僅被某一種傳統框着。但上文提及的價值，一定是所有曾決定留在報社的同學所珍重，並希望傳承下去的。

大學社區報 二零二四迎新特刊

地址：並沒有 ~~~

電郵：cuhkstudentpress54@gmail.com

IG：cuhk_studentp

編輯 / 作者：

Agnes、Kay、狒、媽屎、何如沁、迪、蕉跡、cuhklawtrashtalker、Hazel

設計：Hazel、Kay、Agnes、刪除線、迪

鳴謝：OhKam 撚、@allcancan.cuhk、B 哥、流水山城、山承咖啡廳、楊政賢、
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2024 山城音樂節搞手、Justin、戴偉民

印量：2000 本

